

保衛香港的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

汕頭村民抗爭與博白縣大騷亂



日本政府推動在靖國神社“合祭”戰犯

大選後一個委內瑞拉革命的新黨派

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資本主義弊病專頁

憶林松祺和謝山

保衛香港的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

振言

香港的言論、出版、新聞自由，正越來越受侵蝕，自由空間越來越被收窄。以新聞自由來說，從無國界記者組織由2002年起比較全球國家或地區的新聞自由指數，可以反映出來：香港的世界排名位，從2002年的第18位，在2003年(因23條立法草案的提出)跌至第56位，其後04至05這兩年，則分別回升到34位、39位，但06年已跌到第58位。(上述數字引自今年5月16日《明報》)

從今年幾個月的有關表現看，今年的排名位更可能下跌。這表現於香港電台被謀剷除其傳統廣播作用，以及《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這兩宗事件上。

現在先說前一事例。關於港台角色的爭議，早在1997年香港回歸這一年開始，多名親中人士猛烈抨擊港台利用公帑挖苦中國政府及董健華等，其中政協常委徐四民更指責港台節目《頭條新聞》是「陰陽怪氣」，促請政府檢討港台角色。他們心目中的傳媒(包括廣播電台)不但不應揭露政府和領導人的缺點錯失，而且更應是政府的傳聲筒和辯護工具，像國內的官方傳媒那樣。

曾特首在05年競選特首時，提出港台應檢討制作方針，望港台用公帑製作高質素節目。這反映他已多少有「整頓」港台之意。在06年間，政府成立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研究本港公共廣播發展路向。後來，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提交中期報告，否定現有的香港電台過渡成新的公共廣播機構的可能性，評定它不宜如此轉型，但在報告中卻不檢討港台的角色，不交待其品牌的正面地方，而只講其負面缺點，很不公道。

事實上，香港電台已有80年的歷史，積累了很多非常豐富的工作經驗和方法，言論和報道比較客觀中立，一般都不偏向袒護政府或任何政黨的立場，從而擁有頗好的公信力。因此，港台已具備著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的條件。

反之，如果無理由地「剷除」港台，另行設立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則後者必須從頭培植其公信力和聽眾，主持的負責人亦難保不為大政黨的成員，代表其政黨的意見和立場，不能做到客觀中立，從而失卻公共廣播機構的必要條件。

因此，我們完全支持香港電台員工要把電台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的主張，反對任何圖謀把它「陰乾」、「剷除」的行動。

再以第二宗事例《中大學生報》(以下簡稱「學生報」)的情色版來說，那是社會上保守的舊禮教殘餘思想掀起的「衛道」攻擊，並利用社會輿論及淫審處等官方機構，打壓那些敢於闖開思想禁區、提出社會存在問題來討論的年青學生。這班衛道士和官方完全採取雙重標準來打壓學生報。學生報是在校內供同學們取閱、研討，所刊的情色版內容屬於學生討論範圍，並非賣弄色情，沒有壞動機，又不涉及商業利益及用途。與之相比較，市面上有無數報刊書籍實則是遠過之而無不及。而在被評為二級不雅後，更掀起許多的投訴：影視處於5月18日為止，共收到投訴《聖經》的有2307宗，遠遠超過投訴學生報的225宗。

對於陸續有人向影視處投訴多本如《聖經》、《可蘭經》及《金瓶梅》等經典著作為「不雅」，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表明，影視處不會接受一些大多數人皆認為是無聊及惡作劇的投訴，亦不會把那些流傳已久，為市民大眾所接納的宗教文獻和文學作品，送交由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5月20日《文匯報》)

他把這許多投訴(對學生報的投訴不算在內)武斷作「大多數人皆認為是無聊及惡作劇」。他根據什麼調查統計的數據宣稱是「大多數人皆認為」的意見呢？他如果拿不出根據，那就是胡說八道，任意污辱所有提出那許多投訴的人士。他以「流傳已久，為市民大眾所接納」作為不送檢審裁處的「理由」，試問又有百分之幾的「市民大眾」已表示「接納」《聖經》、《可蘭經》及《金瓶梅》等呢？這些可不是表現官僚的霸道嗎？

反觀《明報》所作的模擬審裁做法，則是十分可取可信的。該報在21日發表在前兩天從司法機構的名單中邀請8人參加，他／她們都是社會上知名而有學識的人士，結果7人給學生報有關情色版的評級都是「既非淫褻亦非不雅」，只有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評之為「不雅」(他日前宣稱明光社接受了影視處幾十萬港元的資助)。這7位社會人士的評級應該是客觀中肯，可予同意的。由此也反証當局的做法和評級的不公允。

從學生報的橫遭打壓，以及港台之被人企圖「剷除」，可見香港的言論、出版、學術自由正在受侵犯。這些自由是香港的最珍貴的核心資產，港人必須特別重視而齊心加以捍衛的！

2007年5月23日

汕頭村民抗爭的啓示

張開

在中共中央高呼要建立和諧社會的時候，一個很不和諧的事實，便是地方幹部與人民的利益衝突。其中一個原因是前者肆意地清拆民居，迫遷離開，沒收居民原有的土地，把它高價賣給富商建商廈廠房，但不給予原居民以補償，或者給予極少的補償。被強奪去土地的村民無地耕作以維持生活。由此激發起村民的極度不滿，紛紛起來向有關幹部索償，或要收回土地及屋地，於是產生許多群體性的抗爭。這一類抗爭，在各地此起彼伏，而由於官方不予報道，海外很少獲悉。

最近，在鄰近香港不遠的汕頭市兩個鎮，便爆發了同類的抗議非法佔地的鬥爭。多得《明報》的連續報道（後來《文匯報》等媒體也加入報道），使海外得知這新的一宗。據《明報》記者報道，曾多次發生官民衝突的粵東汕頭市，「五一」黃金週期間再度爆發連日騷亂，該市潮陽區谷饒鎮村民因懷疑鄉村官員在土地買賣中貪污，近日發起組織抄家隊，攻擊幹部住家行動，有幹部家被洗劫，有官員被圍攻辱罵，亦有村官家半夜被破門騷擾，警車被劫去並砸毀。（見5月8日該報）

3日後，《明報》記者汕頭再報道：谷饒鎮持續一個多星期的村民圍攻村官寓所事件，仍未平息，並開始波及鄰近的銅孟鎮。銅孟鎮深嶺村數百村民指村支部書記非法賣地，昨晨圍攻當地村委辦公大樓及一家工廠，並要求該廠限期搬走，否則引爆更大規模抗爭。銅孟鎮村民說，當地官員非法賣地情況很嚴重，其中60%至70%都賣給谷饒鎮富商建廠。銅孟鎮深嶺村大部份耕地都已被私下賣出，農民失去維生的土地，卻分文未獲補償。記者在谷饒鎮3天，深深感受到村民對當局的極端不滿，村民痛罵政府「黑暗」、「貪腐」。三輪車司機劉至海說：「每名村書記身家最少幾千萬，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再據《文匯報》5月11日報道：發生如此大的群體事件的導火線是去年底，潮陽區谷饒鎮新坡村大約200畝土地被鄉政府圈賣給村外某富商建廠。當地村政府在沒有經過農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將土地圈賣給他人。一些村民認為政府賣完土地後，並沒有將土地徵用款發放給村民，同時一些鄉幹部卻生活風光。於是一些村民懷疑一些村幹部借圈地而中飽私囊。

汕頭市當局爲了平息民憤，採取較為容忍的態度，使得谷饒鎮的圍攻事件，持續一個多星期，並且蔓延至銅孟鎮。市當局雖然貼出公告，通緝兩名涉嫌

有關的村幹部，但他倆已逃去無蹤。且有關官員遠非只此兩人，村民的憤怒並未平息，因此抗爭仍然持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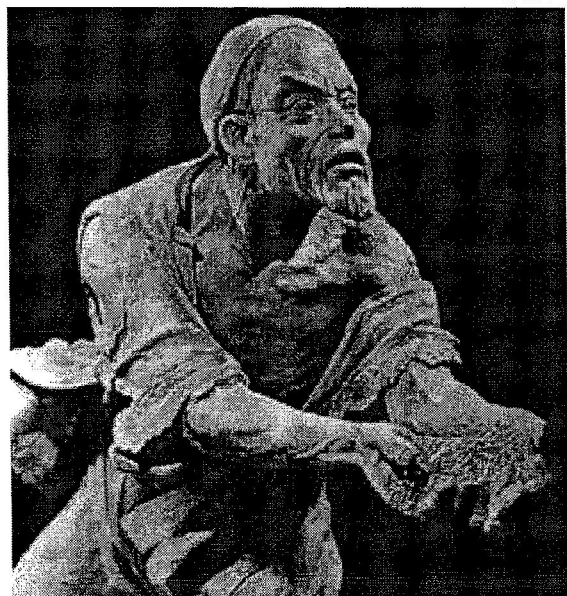
從這宗最新的抗爭（以及無數的抗爭），可以又一次得到啓示：

第一，儘管中共中央不時發出許多的決定、通告，說要嚴懲各級幹部貪污，但地方官員依然置若罔聞，我行我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視中央的禁令如無物，而且越反越貪；這是中共官僚制度所造成的，當各級幹部都幾乎「無官不貪」的時候，中央的反貪通告就變成一紙具文、官樣文章。

第二，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禁止濫佔民地民居，官方刊物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因而今年的要務之一，是城市拆遷，房屋不能說拆就拆，土地徵用，要遏制濫佔土地之風，等等。但實際上這些都在許多地方發生，表明官方的宣稱是空話。

第三，《物權法》提出討論了13年，今年三月已在人大通過施行。它規定，凡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及其他權利人的物權都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及個人不得侵犯。既然村民原有的耕地和住宅都屬於私人的物權，地方政府和幹部怎能加以侵奪，公然違反這項決定？這等於表明：中國的《物權法》只著重於保障工商業資本家及幹部等的私有財產權，而對於弱勢社群的村民和小市民的小量財產則不予保護。這大概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副產物之一吧！

2007年5月14日



博白縣大騷亂的前因後果

張開

繼5月的廣東汕頭市兩個鎮的村民爆發反對無理徵地逼遷的個多星期抗爭之後不到10天，廣西博白縣8個鎮的村民，也爆發了反計劃生育的騷亂，鎮政府大樓被群眾搗毀，焚燒，有計生人員被打死、打傷。

事件溯源於今年初廣西召開的計生會議，指有些縣超生問題嚴重，要博白縣執行上級的命令，以免在受到了「黃牌警告」後再遭處分。

博白縣為此今年連續出台28項計生政策，強調要以「鐵的決心、鐵的手腕、鐵的紀律」對付超生者。

當局下令，凡是1980年以後超生的，不管以前有無罰款，現在都要交1至7萬元人民幣的「社會撫養費」。交不起錢的，計生工作隊就要抄家，將值錢的電器、農具帶走，豬、雞、牛、羊抓走，不值錢的生活用品如鍋、茶壺等，全部用銅管打碎，甚至連家中賴以維生的口糧都要搶走，屋子也遭砸爛。

據內部人士透露，為此，該縣所有公務員被要求在今年8月底前，每人都要完成一例婦女結紮和徵收社會撫養費500元以上的指標。「結果人人自危，執法工作當然出現扭曲。」博白縣一官員稱。（分別見《文匯報》5月22日、23日報道）

縣政府在街道上高掛大幅標語：「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拒不放環、結紮和繳交超生費的，砸，砸，砸！」博白縣是貧困縣，農民無法在限定3天內繳交幾萬元，便被如狼似虎、狐假虎威的計生人員砸毀房屋和物件，搶走有用的財物，執行人員則從中得益。這樣被抄家的農民，將如何生存下去呢？怎能不激起各鎮居民的強烈怨憤，導致官逼民反？

參加騷亂的群眾，據報道有數萬人。新華社引官方的數字是3千人，但《文匯報》22日指稱，「一些鄉鎮最嚴重的時候聚集了近3千人」。8個鎮加起來就有以萬計了。農民長期來都希望不祇限於官方所定的一孩計生政策，他們需要多幾個兒女，亦即是多些勞動生產力，可以幫助耕作或從事其他收入，以紓緩窮困情況。有些人又有「養兒防老」及「傳宗接代」的概念。在農民們的強大要求壓力下，廣西的農村早已放寬為可以生育兩孩，其他省的農村也是這樣，表明中共初時推行的限生一孩政策，由於長官意志和官僚強迫命令行政措施，完全違反人民的意願和利益，越

來越引起一般農民的不滿以至抗拒，促使中共政策歸於失敗，並加深加劇了被統治的人民與官僚統治者之間的對立和基本矛盾。



早在1980年4月中，筆者曾寫了《中國的人口問題及其解決途徑》一文指出：「何時生育、生育多少、節育、墮胎、不育等等，正如戀愛、結婚一樣，都應該完全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別人及國家都不應加以干涉或強迫禁制。」

「要做到節制生育，必須依靠思想教育，和實施更多更好的社會福利制度，如加強醫療保健工作，辦好托幼組織，對老人提供社會保險、服務，使之『老有所養』；又要供應有效、安全、簡便、廉宜的避孕藥具，提供合格的節育工作人員，以確保婦女的健康，等等。」（詳見《十月評論》總第45期，1980年5月20日出版）

將近3年之後，軍行又撰文（題為《限制生育與溺害女嬰》）揭露：在中央雷厲風行地實施「一孩」政策之下，許多生下的女嬰被活生生地溺斃害死，生女嬰的母親則遭到虐待。而根據官方數字的推算，估計82年上半年被溺死的女嬰，可能達200萬以上。（詳見《十月評論》總第74/75期）

在今天，國家雖然以拋離社會主義目標為代價，全面推行市場經濟，使經濟蓬勃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大增，國家財政收入更劇增；但中央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使沿海省份與西部貧困地區的發展和收入之間的距離不致日益擴大，沒有動用大量財政力量去幫助貧困地區的發展，以紓解民困；相反的，上級卻迫使地方政府和人員巧立名目，以徵收超生罰款和「社會

撫養費」為名，嚴苛勒索貧困農民，無法交出巨款的，則被逼到絕境末路。這是官僚吸取民脂民膏，專向弱勢社群埋手的事例，博白縣只是冰山一角，全國不知還有幾多同類的榨取和反抗鬥爭發生，只是鮮為外間所知而已。儘管這樣，人民為反抗猛於虎的苛政，抗議官僚專橫、社會不公和貧富日益懸殊，等等，被迫起來鬥爭的消息仍時有傳出。單以近期以來(不計最近汕頭兩鎮和博白縣8鎮的騷亂)的較大群體性事件就有：

08/11/06 廣東順德倫教鎮千名村民，抗議政府不當徵地，竟把當地出席糧庫開幕儀式的數百港商、官員及外賓徹夜圍困；

15/01/07 四川達州市16歲少女，疑遭官員在酒店輪姦並虐殺，引發萬人示威，並放火燒毀事發酒店；

09/03/07 湖南永州市數萬民眾抗議巴士加價，演變成騷亂，10多輛警車、巴士被人縱火，傳1死，60傷；

21/03/07 江西貴溪市傳出將部份所屬區域撥歸鷹潭市管轄，引發當地兩萬群眾堵塞鐵路抗議。

面對群眾的反抗，當局一方面出動軍警對付，另一方面，暫停催交超生罰款社會撫養費，把那些野蠻可

恨的大幅標語拆除，換上中性化的新標語，使持續了多天的動亂漸趨平息。但有兩鎮和容縣自良鎮仍在強徵罰款，結果再激起群眾包圍鎮政府，有的政府大樓玻璃被打爛，並與在場的保安、武警發生衝突。

上述的許多事實可足夠表現出：中共官員在資本主義經濟意識驅使下，財迷心竅，唯利是圖，只求個人升官發財，不顧民間困苦，與黨和國家主席胡錦濤宣稱的「以民為本」根本背道而馳！

這些倒行逆施，直接加劇了中共統治與人民之間的緊張對立關係，強化了這兩者之間的基本社會矛盾。這完全是中共自己所造成的，它將會繼續自食其嚴重惡果！這種惡果，以下述群體性事件逐年激增可以顯示出來：據政府統計資料，從1994年到2004年，全國非法群體性事件從1萬宗上升到7.4萬宗，年均增加22.2%；參與人數從73萬人次上升到376萬人次，年均增加17.8%。近兩年多的數字雖然手上沒有，但相信不會減少。如此又怎能把中國構建成和諧社會？中共的這個宣告豈不又變成了「偉大的空話」!!

2007年5月28日



日本政府推動在靖國神社“合祭”戰犯

趙京譯

最近，日本國會圖書館發行了《新編：靖國神社問題》，政府厚生省推動靖國神社共同紀念包括 A 級戰犯在內的戰死者。

至少從一九五八年四月開始，厚生省援護局就開始建議先悄悄地將 B 級戰犯以下的戰死者收入靖國神社合祭。靖國神社於五九年開始實行。為此，援護局復員課在“內部聯絡”中特意指示：“鑒於將來合祭在實際上會出現麻煩，希望不要對外公佈合祭中也包括上述戰死者的事情，讓事態隨著輿論的反應自然地推移。”

一九五八年九月的時候，厚生省鑒於“新聞界怎樣報導此事會帶來國民什麼樣的反應，非常嚴重”而沒有討論 A 級戰犯的合祭問題。但一九六六年厚生省卻把 A 級戰犯也記入“祭神名冊”中交給靖國神社，在六九年的兩者會議中決定了也合祭 A 級戰犯。在那次會議中也決定不對外發表此事。

靖國神社從一九七八年以後才開始合祭 A 級戰犯。可惜這次公佈的資料只到一九七〇年為止，至此以後的厚生省與靖國神社的互動關係不得而知。儘管如此，靖國神社合祭包括 A 級戰犯在內的戰犯，是由日本政府暗地裏主導的事實，卻非常明確，是對憲法

第二十條“政教分離”原則的踐踏。進一步講，厚生省把“遺族援護法”規定的“公務死”名單交給靖國神社，就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為此，在一九九一年仙台高等法院對岩手靖國神社的訴訟，一九九七年四月最高法院對愛媛玉串料支出的訴訟，二〇〇四年福岡地方法院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訴訟，二〇〇五年九月大阪高等法院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訴訟，都做出了違憲的判決。

以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日本外交危機為契機，日本支配階層在考慮“A 級戰犯分祭”、“靖國神社的非宗教法人化、國營化”、“建立非宗教的國立戰死者追悼設施”等等，並放出“昭和裕仁天皇也不高興去靖國神社合祭戰犯”的記錄。在自民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傳出來的“新憲法草案”中，雖然也加入第二十條“政教分離”，卻套上“超出社會禮儀或習俗社會的範圍”的定語來限定宗教的含義，讓政權可以與不“超出社會禮儀或習俗社會的範圍”的宗教結合，使“政教分離”的原則名存實亡。這一切，當然是為了推行軍國主義政策，讓被派遣到海外侵略而戰死的“英靈”能夠以國家的名義被追悼、祭奠、讚美。

（譯自《橋樑》2007 年 4 月 16 日第 1973 號）

要求立即解散自衛隊的“情報保全隊”

趙京譯

六月六日，日本共產黨志位委員長在國會召開記者會，發表了自衛隊的“情報保全隊”為了監視反對向伊拉克派兵的運動，收集了大量違法的情報。據自衛隊的內部資料顯示，僅僅在 2003 年 12 月到 2004 年 3 月的短暫期間內，就有 166 頁關於各政黨、工會和個人的監視情報，除了反對向伊拉克派兵運動外，連反對年金改惡、反對增加消費稅、工會為了提高工資進行的“春鬥”等等抗議政府的活動都包括其中。

在“國內勢力的反對動向”中，記錄了全日本 289 個團體、個人的言行。例如，民主黨的增子輝彥在自衛隊的隊友集會上批判向伊拉克派兵，被注為“誹謗自衛隊”；朝日新聞記者到青森兵營去採訪自衛隊官兵，被稱為“反自衛隊活動”；那些有名的作家、導演在反戰集會上的發言，都被記錄在案；我們 JRCL（第四國際日本支部）也在黑材料之中，實在光榮。

這個有九百人之眾的“情報保全隊”是 2003 年設立的，本來的任務是防止自衛隊的情報從內部洩露出去。2004 年 4 月，防衛廳中谷元長官在國會回答日共

議員赤嶺政賢提問時，明確答覆情報收集的物件只限於預先確定的管理防務機密的人，不包括民間人士。而這一次暴露出來的檔案卻顯示自衛隊超出法律規定的範圍，在行使“軍隊員警”的違法活動。對此，新成立的“自衛省”久間章生大臣辯解道：“自衛隊官兵的家族感到巨大的壓力。什麼樣的人會對這些家庭作出什麼樣的反應呢？為了減輕擔憂才從事這樣的情報收集吧！”這簡直是本末倒置；造成自衛隊官兵家族不安的，是追隨美國小布殊政府而不惜踐踏日本憲法向伊拉克派兵的小泉政權；反對戰爭、希望自衛隊立即安全撤回日本的民眾怎麼反倒成為自衛隊官兵的威脅了呢？

自衛隊的“情報保全隊”的這種違法監視、調查活動，正是配合自衛隊向海外派兵、日本軍國主義化的一體化行動。與此同時，向自衛隊立川宿舍或一般公寓傳遞反戰傳單的市民被以“不法侵入住居”罪名逮捕、起訴，把日本社會置於大規模的“保全軍事情報”的事態之下。正如自民黨新憲法草案中要創立“國防

軍”並設立“軍事裁判所”，東京都石原慎太郎知事出動自衛隊進行“防災訓練”，邊野古基地建設中用掃雷艦進行“治安”演習，都強烈傳達出日本統治階層動用軍事員警行使憲兵機能的意圖。我們除了必須監督這個

監視市民運動的“情報保全隊”的違法活動外，更要進一步要求馬上解散這個威脅思想、信仰、言論自由的軍事機構。

（譯自《橋樑》2007年6月25日第1982號）

靜岡縣民抗議開發機場自焚身亡

趙京譯

當我九十年代初在靜岡縣的一家諮詢公司任職時，就知道在石川知事（縣長）推動下修建新的靜岡機場的計畫。那時候，雖然日本的泡沫經濟破裂，石川等官員宣稱日本經濟3-5年後會復蘇，而機場建設是長期發展計畫，現在建成正好為幾年後的經濟成長所利用。我所在公司的顧問曾經是石川的秘書，積極為公司在機場開發的過程中試圖拉一筆生意。

現在已經十幾年過去了，日本的泡沫經濟不可能再現，連“關西空港”那樣的最大機場都由於人流不足陷入深刻的赤字，使大阪市宣佈“財政危機”，靜岡這樣的中等城市更沒有指望會有大批乘客湧來。靜岡的縣民們十幾年來，組成“不需要機場縣民會議”，以各種形式阻止機場的強行施工。特別是反對修建機場的擁有附近土地的農民，把前來測量、施工的縣政府官員、公司職員阻擋住，從法律程式等方面挑戰石川當局的強制決定。石川原是日本中央省廳的官員，返回靜岡競選知事成功後，利用關係得到相關省廳的支援

（如補助金等），聽不進“八成縣民不會利用此機場”的調查和“每年五億日元赤字”的分析報告，一意孤行，不建成機場誓不罷休。縣民們的抗議也達到了極點。終於，一位五十八歲的縣民在二月六日留下抗議信後自焚身亡。抗議信原文如下：

致石川嘉延

閣下違反縣民的意願，強行修建靜岡機場。現在使用強權奪取農民的土地，把眾多的支援農民的縣民強力排除掉，用謊言讓縣民為毫無必要的機場永久浪費稅金。你與那些把機場吹噓得如何有用的欺騙縣民的建築業犯罪者們同流合污，狼狽為奸，將為縣民留下百年的禍根。面對這樣的不能饒恕的罪惡，我今天以生命為代價表示抗議。

靜岡縣民 井上英作

面對這樣的靜岡縣民，以石川為代表的當局還會繼續開發靜岡機場嗎？

（譯自《橋樑》週刊2007年3月12日第1968號）

勘誤表

本刊總第221期(2006年第2/3期)所刊出的《戰爭年代成長的青年群體》，有以下的錯漏，敬請讀者留意或代為改正，謹此道謝及致歉。

頁數	排位	行數	錯漏原文	應改正字句
38	右	尾5	再爬上劍門	再爬上劍門關
39	左	7-8	師生主體。	師生為主體。
39	右	尾5	校內牆報批評譚	校內牆報批評
40	左	15-16	是帝國主義國家	是帝國主義國家
41	右	尾12	九年去重慶	九年在重慶
41	右	尾8-9	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一九四七年去台灣，改名蘇濤。
42	左	8-9	兵工當勤雜工。	兵工廠當勤雜工。
42	右	4	後釋於出獄	後釋放出獄
43	左	1	一九二五年出生	一九二五年前後出生
43	右	13	坐八抬紅大轎	坐八抬紅頂大轎
46	左	2	煤鐵礦、	煤鐵礦、鋼鐵廠、
47	左	6	閣樓，〈注〉內部叫“白屋”	閣樓〈注〉，內部叫“石屋”
48	右	14	編輯部（“白屋”）	編輯部（“石屋”）
48	右	15	陝西路 江街	陝西路贛江街
48	右	尾2	蔡圓壇	蔡圓壩
49	左	8	天皇 令	天皇命令
49	左	尾12	百花怒放	煙花怒放
50	右	12	無其他資料。）	無其他資料）。

為委內瑞拉新聯合社會主義黨的演講

雨果·查韋斯

以下是查韋斯在2006年12月15日向基層選舉競選團體代表的部分演講。

查韋斯邀請全國人民,他的擁護者,一切革命家,社會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男性和女性,委內瑞拉青年;邀請工人,家庭主婦,專家和技術人員、民族商人,我們這個國家的土著民族,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委內瑞拉的婦女,我邀請他們齊心合力,建設一個聯合政治黨派。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Ines聖戰役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嗎? (1)

在那以後,我曾要求大家不要放鬆基層的選舉和巡邏活動。但他們不聽我的,在全國大多數地區,我們所有的努力幾乎都白費了,只有少數地方還在繼續他們的工作。

好了,現在我們取得了12月3日的偉大勝利,我們不能讓同樣的事再發生,從各營,各排到各小分隊...

所以,我要求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每一個相當於一個營(大隊),一個排(中隊)和一個班(小隊)的地區對所有的激進分子,積極分子,同情者,朋友等等,做一個人口登記和普查。我肯定大家已經有這些資料,但要回去對這些資料逐個檢查和更新。如果你沒有電腦或打字機,那麼就用筆做記錄...

所以,請仔細聽:你們所有的選舉營,排和小隊的指揮官,我建議:從今天開始,立即行動!這樣我們可以由基層開始建設一個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 簡稱PSUV),因為這些營,排和小隊將是PSUV黨貫穿全國的基礎國民組織。

如果明天或後天我們成立了這樣一個所謂的政黨,一個政治聯盟,結果在這裏的講臺上出現的是.....像以前一樣的老面孔,還是這幾個黨派的原來的領導人,他們只是聚在一起,那是我們想要的這個黨嗎?那麼,我們如何面對歷史?不!那會是一場可怕的騙局!

當然,我身邊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選擇,甚至是我的兄弟Adam.人人都可以自由選擇. MVR (Fifth Republic Movement, 第五共和國運動), PPT (Fatherland for All, 祖國), Podemos (For Social Democracy, 社會民主), PCV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MEP (People's Electoral Movement, 人民選舉運動), UPV (Venezuelan Popular Unity, 委內瑞拉民眾團體), Uncle Tom Cobbley 及所有的團體..... 我讓他們自由選擇。

任何政黨,如果他們想維持黨派活動,他們都可以,這得由他們自行做主,當然,他們不得不脫離我的政府。

對我而言,我只希望一黨執政,僅僅一個政黨。因為每天都有更多黨派出現,一堆的政黨。

我們不要分離我們的民眾。

我們要團結愈來愈多的民眾。

你們看,這些書記載的是歷史的一部分.這是我推薦的由Marta Harnecker寫的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左派政黨過去都發生了什麼,只有一兩個是例外的。他們模仿布爾什維克黨的模式,只因爲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10月蘇聯誕生時是相當成功的。

我們都知道,布爾什維克和Mensheviks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分裂了革命活動,而最終,能夠帶領和鼓勵人們進入革命的政黨是弗拉基米爾·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

後來,政治路線偏離了,那是斯大林偏離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路線。當時,列寧無法避免,因爲他病了,且英年早逝。在列寧去世僅僅幾年內,斯大林偏離的政治路線使得布爾什維克黨變成了一個反民主黨,那一個精彩的口號所有權力屬於蘇維埃最終變成了所有權力屬於布爾什維克黨。以我不過分的見解,社會主義革命導致蘇聯的誕生,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路線變異主要來自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只要看看70年後所發生的一切.....。

當蘇聯解體時,工人站出來爲此(政權)辯護否?這原本是工人的政權或制度,但工人從不出來爲這個政權抗爭。非常奇怪,是不是?爲什麼這個會發生呢?因爲工人政權是被一群上層人士所統制。它變成了一個上層人士的政權,這個政權不能夠建立社會主義。我們現在要走的是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我們走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風格道路。

在這個新時期,我們需要創立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這就是我的提議。讓所有這些委內瑞拉左派來幫助這個黨。在我提議我們建設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政體,讓我們所有的委內瑞拉人都開始努力,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需要從每一個營,每一個排,每一個小分隊開始做人口登記。

從一開始我們都知道,我們必須對道德品行和道德準則有非常嚴格的要求。這要依靠你們,因爲你們知道自己社區的成員,在這裏,決不許盜賊和腐敗分子進來...

當然，聯合社會主義黨將是委內瑞拉歷史上最民主的黨派，確實就是最民主的，這個黨將接受全國上下的政治討論。

基層人員將選擇他們的真正的領袖。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那些名冊。我們已經受夠了一些剛被選的候選人即受到某人的指責。儘管在地方和州這現象並不是很常見，不過，我自己倒是經常指責他人。當然，當我被要求來決定誰是候選人時，我總是盡可能公平待人。

當然更好的方法是候選人是自下而上，來自基層，這樣的話，就能夠讓人民做主。就如同7年前這些條款被寫入憲法中，但我們還從沒有實現過。現在，這個時刻已到來……。

現在我們的黨派不能只是因為選舉而成立，儘管它與選舉有著密切關係，我們的黨要超越於單純的選舉。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現在是我們建立黨的好時機了。在近期內我們沒有選舉的需要。這個就是社會主義黨，實際上，我會稱（從下往上）它為社會主義營，社會主義排，社會主義小分隊。

我們必須鼓勵進行思想論戰。這不再是競選論戰。毫無疑問，我們會在今後幾年進行選舉論戰。這是一場就社會主義建設的構思的思想論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你們必須努力學習，你們需要多多學習，大量閱讀，經常討論，組織各種協商會議，組織（一個）小分隊會議，組織（一個）排的會議。是的，大量閱讀。我們中那些處在領導位置的人，他們已在推動這場運動，並會繼續推動，我們一定要傳播大量資訊，散發傳單等等。

Mariategui——二十世紀初的秘魯偉大思想家——曾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必須是一個崇高的艱辛努

力的建設……。

根據Mariategui，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最根本的一個立足點——今天我再次重申，並不是因為是他所說的，而是根據我在現實生活中所看到的，確實今天我也看到了，當我頒獎給我本地的兄弟們的時候，這些兄弟們來自四面八方，如Capanaparo, Tronador, Barranco Yopal 和 Amacuro Delta, 在這些地方我們幾乎贏得了100%的選票。所有這麼多的原因讓我相信——在我們的領土，在我們的國家，在我們的美洲，那些土生土長的人民是社會主義種子的運載人。

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了幾個世紀，假如你去拜訪我們Kuivas的兄弟們——在那裏我獲得了100%的選票。Kuivas 是Carabali幾個市鎮中的一個，在Carabali的幾個市鎮，我獲得了100%的選票——在Capanaparo的兩岸，(你會看到)那裏居民至今依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

因此，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國家社會主義化，另外一方面，我們不能僅僅是嘴上講社會主義道德……。

要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經濟模式，我們必須經濟社會主義化，生產體制社會主義化，創造一個真正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化體制——我們現在正在這方面努力，但是目前我們僅僅只能看到前方道路的開端，因此 Zamora 基金和 Nuclei of Endogenous 發展……。

注釋

[1]2004年8月贏得戰役罷免公投

[2]文中的姓名指的是2006大選中被推選的選舉人代表

[3]dedocracia.

[4]土地改革



大選之後：一個委內瑞拉革命的新黨派

斯圖爾特·派普爾

雨果·查韋斯（Hugo Chavez）已經明確了他的總的意圖。由於在總統選舉中大規模獲勝的形勢趨於明朗，3月12日晚他來到米拉弗宮的陽臺和他的支持者們見面。在滂沱大雨中，他和追隨者們一同唱起國歌，

高呼“社會主義萬歲！”。他說現在的任務是進一步深化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革命，“人們不應該害怕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人道的，博愛的...委內瑞拉是紅色的，紅色即將到來”。

兩周後，他闡明第一步大的舉動：成立一個團結的政黨，以取代一貫支持他的但已運轉不良的黨內機構群。他說，他腦子裏已經想好了一個名字：-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the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或PSUV（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他向來自基層的競選單位的代表們發表了演說。這些競選單位組織了他在全國範圍內的競選活動，據他的數位顯示，一共擁有11000個“營級單位”、32800個“排級單位”、三百八十萬個“小分隊”。他告誡他們，所有的這些力量不能就此自動解體，而是應該再次舉行會議，擬定登記會員制度，同時讓這種新制度，成為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的基礎。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動。原則上，這是一個委內瑞拉國內外的革命力量都應該支持的黨派。對於那些優秀的玻利瓦爾激進分子來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他們的運動中存在著分歧。在查韋斯始終鼓舞人心的領導和委內瑞拉人民中爆發的局部行動以及自治行為之間，缺乏一個有效的、全國性的組織。

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健全的運動組織的問題已經開始由類似工會聯盟(UNT)的新工會和Frente Campesino Ezequiel Zamora的農民組織解決了。(委內瑞拉從沒有搞過類似巴西的無土地者運動，厄瓜多爾的本土化運動，或玻利維亞的社會及團體運動的大眾化)

但在另一方面，所謂的支持這一行動的黨派，最主要是查韋斯自己的第五共和國運動MVR（the Movement for the 5th Republic），以及PPT（Patria Para Todos）、Podemos、委內瑞拉共產黨和一些小的組織，根本無法充當能夠面對分歧、敢於果斷決策和行動的民主的、集中的組織機構。他們大都是些官僚機器(有時甚至舞弊)，他們的任務就是操縱選舉辦公室、安排職位和好處的分配(很像傳統的委內瑞拉前查韋斯第四共和國)。

因此，急需一個真正有效、多元、民主、大眾的革命組織。查韋斯最親信的幾個顧問至少在過去的兩年中一直在談論這件事情。一些小的委內瑞拉社會主義革命力量曾經幾次試圖把力量聚集到一起形成一個大眾的革命黨派。2005年7月形成的革命社會主義黨PRS（The Party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ism），主要包括來自Moreno的托派系勢力，就是一個例子。而涉及烏托邦和社會主義聯盟的Frente de Fuerzas Socialistas 則是另外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沒有查韋斯的直接支持，這些勢力註定只能是少數力量。

查韋斯對發起這些行動所給予的評論也是令人振奮的。他堅持，這個新的黨一定要是委內瑞拉有史以

來最民主的黨，它必須要從社會基層建立起來，邀請所有的左派力量加入。他還堅持黨既不能完全由選舉也不能由現有的政黨聯盟的領導人來支配。他批評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所作所為不是促進而是窒息了社會主義運動。他回憶起那句精彩的口號“蘇維埃領導一切”是如何蛻化成了一個讓人傷感的現實“黨領導一切”。他所有的這些觀點直接表明建立一個大眾的、民主的、革命的政治組織的必要性。

但建立這樣一個新黨也存在很大的風險。在玻利瓦爾的革命中人們已不是第一次提出嚴肅而必要的質疑，這個新黨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不辜負民眾的期望。這種質疑有兩種。首先，究竟誰會加入這個黨，是否像正在進行的，多數現有的主要黨派立即融入？另外，難道它真能夠打破官僚家長作風，甚至腐敗這些常常對革命的根本問題起到破壞作用的頑疾？(包括例如工人的控制和地方參與民主的徹底性)

甚至在查韋斯定基調的講話之前，PRS 和UNT 的領袖，例如史達林·佩雷茲·波爾格(Stalin Perez Borges)就明確指出了對新黨的籌備方式的擔心。他指出了中間派的Chavista 州長和MVR的高層對於“一切都已經定好了”的說法，以及政治力量們關起門來進行的如何締造一個新黨的談判所進行的評論。史達林·佩雷茲講到，工會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政治勢力和知識份子應該建立一個關於民主討論的論壇。在論壇上，所有支持深化革命的基層力量能夠真正討論他們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立這個黨。

第二個問題和第一個問題是重合的，指出了玻利瓦爾省行動核心中的自相矛盾。查韋斯本人想像中的新黨可能是最好、最根本的民主模式。但是，向這個方向邁進的決定顯然是由他一個人做出並且公佈於眾的。現在這也許是打破由MVR以及其他黨派形成的習慣勢力造成的僵局的唯一辦法。但是這反而會對所要推行的社會主義民主造成危害嗎？

2006年在加拉加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委內瑞拉著名左翼知識份子Edgardo Lander指出：“迄今採取的這種缺乏公開辯論的形式是極其令人擔憂的，特別是如果我們假設這可能預示著，在21世紀，這種形式應該由關於社會主義的辯論來完成。從多元性和民主的角度看，如果一個政黨的產生是由政令宣佈的，那麼我們會期待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呢？如果那些基本的選擇是作為早已在辯論之前做出的決定而公佈的，那麼一場關乎國家未來的民主的、多元的、爭論性的辯論還有可能嗎？

(斯圖阿爾特·派普爾是《國際觀點》在委內瑞拉和拉美其他地方的記者。)

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來自委內瑞拉的最初的教訓

斯圖阿爾特·派普爾

在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的核心裏存在著一種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局勢已經存在了若干年。但是自從雨果·查韋斯2006年12月再次當選總統，宣佈啟動“五部發動機”來推動國家走向“21世紀的社會主義”，以及他號召組成一個新的統一社會主義黨來組織這一過渡的幾個月以來，這種局勢變得更突出了。這是存在於革命的反新自由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成就與對社會主義承諾之間的緊張局勢——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成就是不可否認的，而對社會主義的承諾卻依然只是一個承諾。



正是委內瑞拉政治結構改革的深入——它的通常是喧鬧的，然而對華盛頓輿論認為的市場驅動優先的真正破除——首先為全球公平運動和國際左派建立起了一種如同燈塔似的進程。也正是這種一貫的反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使得雨果·查韋斯在2005年1月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上受到歡迎，甚至是在這位委內瑞拉領袖對那個“S”開頭的字（社會主義）做出任何承諾之前。

這種影響超越了拉丁美洲和傳統的歐美聯盟。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一個是來自印尼，在那裏新的左派黨PAPERNAS 反復參照委內瑞拉的樣板來為重新確定國家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的主權進行解釋和定位。另外一個例子來自埃及，在那裏開羅的集市有個傳統，人們常用公眾人物的名字來命名折扣日，作為每一批乾果質量的評判手段。難怪在去年的黎巴嫩戰爭之後，最貧窮，最受苦的人被叫作“布殊”、“貝理雅”

和“奧爾默特”。也就更不奇怪最美好的，最甜蜜的日子被叫作“Nasrallah”——真主黨領袖的名字。但是在這些好聽的名字裏，有一個來得稍遲一步，他就是“查韋斯”。這位委內瑞拉總統為了抗議以色列的侵略從以色列撤回了大使。

這不過顯示了委內瑞拉對帝國主義無畏的反抗在曾被稱為“地球魔鬼”的上千萬帶頭巾的人當中的一種非同尋常的共鳴：這是一種在2002年4月反查韋斯政變失敗以及自2003年以來健康與文化“使命”發展之後開始感覺到的共鳴，是幾十年來未曾經歷過的。

但就在最近，出現的其他事情給了委內瑞拉的發展進程一個更大的，意義更為深刻的影響。這始於2005年受查韋斯的邀請開始討論“21世紀的社會主義”，這種討論在2006年他做出承諾之後的今天甚至更強烈地延續著，這正是委內瑞拉接下來一個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當然這對委內瑞拉國內鬥爭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這也改變了它的國際潛力。

首先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在過去17年甚至更長時間裏已經從大多數人的政治辭彙表裏消失的國家裏的人來講，突然間變得有可能談論社會主義，而不會顯得像是剛剛從另外一個星系飛回來。不僅如此，委內瑞拉是第一個活實驗室——至少從80年代的尼加拉瓜以來是這樣——這個實驗室可以測試出21世紀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可能是個什麼樣子，以及有什麼樣的戰略可以實現它。這樣的一些戰略性的問題在最近一些年裏已經開始以理論的形式重新出現。例如在法國的LCR（革命共產主義聯盟）的<<共產黨員批評>>裏就已經有了一個很重要的辯論，涉及到了丹尼爾·本賽德、安托尼·阿爾圖斯、阿萊克斯·卡裏尼克斯和其他人。圍繞著這些中心問題他們提出：在目前的情況下，難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必須經歷好象當年“東宮風暴”那樣的舊的國家機構崩潰時危機的、爆炸性的時刻，經歷暴動者的總罷工，或者經歷一種漫長的、眾人參與的軍事鬥爭嗎？或者可能想像一個保護新階級利益的新國家機構能夠伴隨著或甚至就在保護舊階級利益的舊國家裏出現嗎？

這很可能是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運動所面臨的最具決定性的問題。為了避免簡單化，委內瑞拉的政治

進程可以描述為一種民族主義的、反新自由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在其中有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出現。奇怪的是這兩方面都在查韋斯的個性當中顯現出來。社會主義革命正在爭取出現，因為這是一個首先發展自1998常規（那是中產階級的代表）選舉獲勝的進程，當時得到了各階級聯盟的廣泛支持，而至少到2002年的未遂政變發生時，還沒有做什麼來跨越制度上框架。當然2000年的新玻利瓦爾省憲法對其制度進行了大幅改動，而且談到了許多關於公眾參與、人們需求與潛力的核心等根本的問題。但它並沒有觸動基本的財產（既有授權的財產、也有代表性民主的財產、或者私有財產）。在某些程度上，這保護了曾支持他的階級聯盟。

自從2002年反對政變的起義以來，特別是從當年底反抗雇主的停工鬥爭以來，民眾的動員、Missions（派出執行任務）、城市土地委員會、一些控制工人的零星的或部分經驗、鄉村和城市的合作組織、和最近出現的公社委員會，已經開始超越舊的框架甚至要挑戰它。但是委內瑞拉權力的中心杠杆——包括總統辦公室本身——在舊的管理機構下，仍保持制度上的原封不動，甚至“陷入其中”。玻利瓦爾省運動遇到的問題——也許也是當今世界大多數能夠想像到的革命所遇到的問題——是第一次掌握政權時（比如當選），如何回避現存的機構？



委內瑞拉的情況是，這個問題與另外一個問題相關聯：這個運動怎樣發展成一個真正的集體領導格局，而從一個革命“領袖”的全面統治中解放出來，當誠信且有能力的查韋斯本人似乎也承認轉變是必須的時候？

委內瑞拉最近發展的兩個情形，其中一個稍稍早一些，似乎找到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稍晚一些的則是開始於2005年早些時候在一些工廠發展起來的工人監

督的聯合管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在Ciudad Guayana的ALCASA鋁廠。這種嘗試的傳播還是有限的，實際應用也不完全，同時有一些令人擔憂的跡象出現，它已經失去了核心領導層的支持。在12月和1月概括了革命新階段優先考慮的問題的主要講話當中，查韋斯幾乎根本沒有談到這個。但它仍然是迄今最有雄心壯志和最鼓舞人心的對舊體制進行根本更替的範例。另外兩個最新的發展是號召成立統一社會主義黨，作為“委內瑞拉曾有過的最民主的黨派”，還有就是被查韋斯定義為第五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委內瑞拉向21世紀社會主義過渡的發動機。

這三點合起來再次驗證了一個古老的事實。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民主——民主從根本上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由於此，歸根結底，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實際上，生產手段的“集體所有”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意味著對經濟的民主的、集體的監督和控制。

這也就是查韋斯總統在1月8日向他的新政府宣誓時所描述的公社權力的挑戰。

“今年我們要隨著公社委員會超越地方局限。我們要首先立法產生一個地區、地方和國家的公社委員會聯盟。我們要向公社國家前進。在我們建立公社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玻利瓦爾省國家——一個有能力進行革命的國家的時候，舊的中產階級國家還存在著，還在垂死掙扎，我們要一點一點打破它。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天生會阻撓革命。所以我們的任務很重：要把一個反革命的國家轉變成一個革命的國家。

這的確是高瞻遠矚的見解。委內瑞拉革命的前任部長羅蘭德·鄧尼斯——通常是來自左派的查韋斯的批評者——在說到公社委員會時還是很公正的——公社委員會計畫將200到400個家庭聚集起來，討論和決定地方的開銷與發展計畫——提供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撤開中產階級國家來做這件事情。理論上講，已經有了18000個家庭。這個數字應該上升到30000。實際上很多已經建立起來並開始運作。

但是目前有兩個能夠預料的關係公社委員會的問題。一則他們不是完全自治的。他們依照“舊國家”起草通過的法律法產生和控制，雖然這個舊國家居住著查韋斯派的人。這與阿雷格里港的參與式財政和巴西其他地方的一些激進的示威行動大不相同，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鼓舞了委內瑞拉的主動性。那裏參與式財政是由貧窮的鄰國的社會運動和在地方政府中的黨派（工人黨或叫PT）非正規地建立起來的，他們鑽了巴西後獨裁憲法的空子。它的一個基本指導原則是它必須是自治的和自主的；從來沒有對參與式財政進行過立法，它自己起草自己的章程並可以任意修改，而且地方政府和黨派的代表都不能直接對此事發言。

二則，也是與阿雷格里港的參與式財政不同的是，公社委員會對地方財政沒有百分之百的主宰權（這是阿雷格里港經驗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則，雖然只是部分實現）。事實上委內瑞拉公社委員會討論和花費的錢是由公社權力總統委員會一次性劃撥的，去年總數大約16億美元，今年大概兩倍於這個數字。他們不控制現有的公共財政，也不清楚他們與目前由當選的市長、州長和地方立法機構委任的資源和管理機構的關係，是否他們將會開始吸納並取代這些或者僅僅是和他們共存。

這兩個問題是彼此互為因果關係的。除了近年來爆發的各種各樣的地方運動外，委內瑞拉既沒有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的傳統，也沒有一個群眾革命的，或甚至只是階級鬥爭的，能夠組織這些行動的黨派。某種程度上，“查韋斯現象”代表著這兩者。

這就是為什麼號召建立新的統一社會主義黨（PSUV）是一個潛在的重要步驟。這也許是超越對核心領導依賴的最佳途徑。但是它必須是一個真正開放和民主的黨派，而不僅僅只是傳遞已經做好的決定的龐大機器。這對委內瑞拉的幾支已經把他們自己定格為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小流派和黨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來自明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傳統（PRS或叫革命與社會主義黨），包括目前分化的國家工黨（UNT）的工會聯盟的核心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裂，一些著名的領袖選擇加入PSUV的計畫，而另一些已經決定不參與到其中去。在我們看來，前者絕對是主張不能錯過這次機會，而且主張正是由於存在計畫可能被一些舊的官僚分子劫持的危險，革命者們必須起來鬥爭，從而保證PSUV是完全民主的，而不包含一直從內部破壞著玻利瓦爾省革命的委內瑞拉資產階級和新官僚主義的代表們。這與由80年代第四國際（FI）的同志們發動的鬥爭是非常相似的，那次鬥爭將工人黨（PT）發展成一個“沒有老闆的工人黨”而且擁有最大的內部民主，有完全的選擇政治傾向的權力，按比例分配領導層中的少數派別代表，30%的席位給予婦女，等等——那是一個取得巨大勝利的鬥爭，而且在使工人黨（PT）在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裏成為國際左派的燈塔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總之，委內瑞拉的革命進程似乎面臨著三種當前的和中期的挑戰。1）這一新的黨能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群眾的革命黨——就是說它能不能提供一種徹底的多元化的、民主的空間來組織和協調委內瑞拉工人階級（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講）的所有分支和流派，還有社會的其他受壓迫的階層？2）開始於ALCASA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監督和工人共同管理的範例性模式能夠延伸到

到更廣泛的公共和私有的部門嗎？這些能夠和公社委員會還有其他形式的大眾區域權力聯繫起來，並把民主監督貫徹到工作場所和更廣泛的經濟活動中嗎？3）新的公社委員會能成為真正的大眾權力中心，接管地方和區域的財政與發展計畫的主宰權嗎？這些團體能夠在全國範圍內聯繫起來建立一個能夠保護大眾利益的國家嗎？

換句話說，當前的挑戰是民主。他們指向參與式民主由正式的政治範圍向社會大廈的各個角落的根本的延伸。那當然就是社會主義在21世紀之前、當中和之後本來應該的面目——一個史無前例的民主權力的深化。如若這樣看待這個問題，那私有資本的國有化和剝奪的問題就變成了一個自然的結果而不是前提。因為一旦資本家不再控制資本，而是在地方和國家範圍內都交由工人和社會做出民主的決定，那它就不再是私有資本而開始遵循不同的邏輯——人類需求與潛力，還有目前最緊迫的生存環境問題。這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是不斷革命理論提出來分析的問題之一，有的甚至是在一百年前。

（斯圖阿爾特·派普爾是《國際觀點》在委內瑞拉和拉美其他地方的記者。）



世界社會論壇

權力屬於人民

丹尼艾爾·方特因

大約有四萬人來到內羅畢參加第七屆世界社會論壇（WSF）。這次論壇的特點是擁有眾多的非洲與會者以及充滿著辯論。全球正義行動組織已經策劃了一系列的帶有反抗性的動員行動。

在社會運動的集會上，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由南非婦女革命組織指揮的積極分子們，齊聲重複著那句傳奇的反種族隔離的戰鬥口號：AMANDLA! OWETU!（權力屬於人民！）。這一情景展現了非洲鬥爭的力量和持久性，以及意義深遠的國際性。

爲了它的第七次大會，圍繞著“人民的鬥爭，人民的選擇”這個主題，WSF把大會安排在非洲大陸舉行。在一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留著新自由主義和戰爭蹂躪的印記的大陸，這曾經是一個確定社會運動的問題，這些運動由來已久，但常常鮮爲人知，他們是鬥爭，是反抗和尋求新的選擇。論壇上的辯論，是伴隨著發生在整個地區最大的貧民窟的大規模抗議開始並且結束的，它在全球及局部地區都引起了共鳴。

這到底是公眾健康問題呢還是反戰問題呢？健康問題：據估計，從現在到2015年將有近1.2億的非洲人可能會死于醫療保健的缺乏，更不用說目前愛滋病的肆虐；反戰問題：幾天前美國飛機還在轟炸鄰國索馬里。

由於許多群體和地方社區組織的存在，婦女運動是容易被看到的。宗教群體和大型非政府組織的重大的動員活動反映了他們在當地社會的舉足輕重以及他們工作的現狀。這也不是完全沒有矛盾產生的。那些爭取婦女權利的組織或者抗擊愛滋病的宗教組織，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進步的觀點往往不太爲人所知，這就導致了爭論的發生。但我們也能看到，像強烈要求平等權利的非洲同性戀團體組織，就得到了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這樣人物的支持。

WSF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要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對於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來說，這是一個從抵抗到反抗轉變的問題，是一個更有效地組織起來開始實施具體變革的問題。正是圍繞著這個基本觀點，下一次國際動員行動的日期已經敲定。這一活動將在2008年和世界行動日一同舉行，並且取代WSF。在06年值得人們記住的重要日子裏，有三月二十日那個週末的國際反戰總動員，五月的國際居住權力日，還有六月份在德國羅斯托克舉行的反對G8的行動，十

月的要求免除債務的活動，以及十二月份的反氣候變化活動。這些行動將再次證明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來改變如今世界混亂的緊迫性。

處在爭論焦點的非洲

讓·南加

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的非洲人，無論男人和女人，來參加世界社會論壇。與會者的人數比先前舉行的非洲社會論壇的多五到七倍，而且與會者更加代表了非洲國家的多樣性特點。

從來沒有這麼多的會議關注非洲的資本全球化的現狀，也沒有這麼多的會議使不同的觀點能夠得到充分的表達。例如在先前的開幕式上，在混居著不同年代，不同出身的人們的大帳篷裏，在一個對同性戀鄙視，其實是把壓制視爲正常的大陸上，還是可以看到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身影。爲了廢除在非洲的外國軍事基地，一個團結陣線成立了。中國和非洲國家的活動家們一同探討過關於中國目前同非洲新殖民主義或南南合作的關係的本質。非洲和法國的社團討論了法國與非洲的新殖民關係。幾內亞代表團提供了一樁導致五十人死亡的非法鎮壓罷工者的事件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抗議集會。

然而，非洲人民由於大片土地被基督教堂和激進派別佔領而飽受著痛苦。由於資金充足，教堂能夠大規模掌控非洲事務，不論是在肯雅還是其他地方，都是這樣。組織委員會通過實施一個基於金錢的歧視性手段，對激進的貧民窟組織關起了大門，委員會向他們收取相當於當地最低工資四分之一的懲罰性的註冊費。這是一個把獨立于富有的非政府組織的“地球受難者”組織排除在外的方法。

激進派最終還是設法通過由貧窮人的激進組織所指揮的行動獲得了自由進入WSF會場的機會。但是大量的商業廣告台還是引起了人們對社會論壇“商品化”的尖銳批評。一個要求“免費食物”的行動被組織起來，抗議一個屬於肯雅內務部的飯店，該飯店提供抑制性價格的食物。其身影隨處可見的移動電話跨國公司Celtel也遭到了譴責。曾被排除在WSF的籌備工作之外，由來自Kibera貧民區的積極分子組成的人民議會，在市中心的一個公園裏組織了另外一個論壇。全球正義覺悟組織的基本特點由他的發言人闡述，特別是非常沉著的萬圭·姆巴帝亞給人們展示了貧民區居民的一個不同的畫面。

[讓·南加是一名剛果革命的毛澤東主義者。]

官方報告：資本主義正在毀壞我們的地球！

衛眾譯

關於全球氣候變暖問題，聯合國國際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最近在巴黎發表的報告已改變有關這個問題的辯論的措詞。這是迄今最全面的研究，也是今年首次公佈了這一系列的報告。

(IPCC)先前的多篇報告(這是第四份類似的報告)已經就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辯論定了“官方”的基準。

這項最新報告的結論是，全球變暖將產生破壞性的影響遠遠超過IPCC以前的預言，並會在較短的時期中出現。報告說，全球變暖的跡象現在“明確地”，“幾乎可以肯定地”(95%以上)顯示是由於人類活動所造成。

報告推斷：人類發展的標誌——人類對氣候影響的明顯跡象不僅已經表現在全球平均地面的溫度，也影響在全球海洋溫度和海洋熱含量。IPCC警告指出，最近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的幅度已遠遠大於過去65萬年的自然溫度變化。

迄今，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導致全球性溫度上升0.6C。報告又指出溫室氣體繼續上升的最可能結果，將在2100年，溫室氣體很可能使全球另加3C。很不幸，雖然報告中承認2C--4.5C 的上升幅度現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可能會有升幅到6.4C的遭遇。

報告指出，自從有記錄以來，以前13年中有12年是最暖的；兩半球的冰河 積雪和凍土已減少。目前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幾乎是每年2毫米。

報告還發現，不斷上升的全球氣溫會侵蝕地球吸納人造二氧化碳的本能。這可能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了44%。在2100年的時候全球平均溫度會另增加1.2C。

因此，預示著暴毀滅性風雨的頻率將大幅度增加。本世紀海平面將上升約半米，沙漠會蔓延；海洋成為酸性、和致命熱浪將變得更加普遍。非洲、亞洲、南美和南歐部分地區會變得不適於人類居住。在本世紀末，倫敦中心將會在海水平面之下。

這災難性的影響，迫使億萬人們逃離蹂躪的家園，尤其是在熱帶、低窪地區移民浪潮的推動會造成最富有國家的經濟緊張局勢。

關於IPCC的報告，令人擔憂的是它的結論都只是建立在最低的認可度之上的。這是數千氣候專門工作人員的工作。就溫室氣體如何產生其影響，他們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會產生重大影響，有的認為

作用較小。只有那些被認為是沒有爭議的觀點得到了認可。因此，總的來說這是一種保守的意見。

對那些繼續認為太陽能量輸出的自然變異是氣候變化的真正原因的人，IPCC予以斷然拒絕：“這些大自然變化過去發生在一個非人為作用因素（比如太陽和火山作用的總和），而這些非人為因素被認為是引起氣候變冷而不會變暖”。但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過去250年，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對氣候的影響是任何太陽輻射波動影響的5倍之多。

IPCC的報告顯示，對氣候的變化、什麼引起全球變暖、什麼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的辯論，作了一個決定性的改變。

其實，社會主義者和環保運動人士不會對這些報告結果感到驚訝；許多社會主義者和環保運動人士得出的結論已超越那些報告中謹慎的結論。可是，IPCC改變辯論方向的事實將會鼓舞他們。

但是，這個報告，或IPCC，或是聯合國，在此沒有並且也不會提供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他們的答案是通過象碳交易的市場解決方案來達到綠色資本主義。顯然的，人類和地球的需求無法符合資本主義為利潤而無情擴展。（尤其在目前的新自由主義形式下變得更糟。）

目前迫切需要對全球性法定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大多數環保運動人士期望在2030年減少90%的CO2的排放量，假如要制止全球變暖，同時，各國政府須採取必要措施改造重大基礎設施，大量投資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力。但至今唯一達成的是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此協定中各方同意降低那微不足道的5%。京都議定書的主要原則——碳化交易——已經失效，而排放溫室氣體繼續上升。

相反的，市場機制能夠真正對付這種局面的時間早已遠去。根據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我們必須爭取一個不同的制度。那就是一個民主的計畫和自我控制，而非由市場的需要來決定。只有生態社會主義規劃才能為這種變化提供一個架構，那就是必須創造一個生活在這個地球的長期未來。

[刊於社會主義抵抗運動(Socialist Resistance)，由英國第四國際的支持者協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出版]

大壩工程與人類命運

周仁生輯譯

在全球各地為開展生態運動而鬥爭中的主要問題之一，便是解決大壩工程問題。例如納曼達（Narmada）大壩或伊利索（Illisu）大壩等。

大壩建設對於綠化來說取得了部份成就，因為水力發電總比核能發電更少污染。不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的污染，就必須在世界某些地區減低電能消耗——美國總統克林頓曾號召聯邦政府，到2010年時，能源用量要減少35%。

1999年6月，華盛頓全國水電協會批評了克林頓，指責他置水電於不顧，按計劃應更多地使用再生能源來降低溫室氣體污染。水力發電是再生能源，這是無可爭議的，而其意義十分重大。再生能源基本上是無限制的。

這個要求的提出，給美國政府帶來了很大壓力。現存的水壩有的已經廢棄，因為會給生態保護帶來深刻的負面效應。

築壩問題的提出，特別是跨度關係到多條河流的時候，這個問題要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設想的環境保護問題要大得多、嚴重得多。

在左翼人士中，有一種保守思想，認為人類只是受到社會問題的影響，而生態學只是對其他動植物的研究。

建壩政治學研究表明這種區分是毫無意義的，大壩建設會引起數百萬人遷移，毀掉了他們的家園和生計，通常還會影響到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社區，而這些少數民族都是地球上最原始的民族。

例如：庫爾德人受到伊利索大壩的威脅；印度有數百萬氏族人民被剝奪了家園；加拿大的拉布拉多附近，伊努以特（愛斯基摩）人正在反對丘吉爾瀑布擴大建設工程，這個擴建工程的目標只是以廉價把電力銷售到美國東北地區。七十年代他們已失去大片土地，卻得不到任何補償。在越南有103,000人，其中包括少數民族將要遷移出去，為的是要在桑拉省山區築水庫建設一個水力發電廠。

築壩問題同樣會引起水源的控制問題，容易引起跨國界的政治糾紛。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水源是遠離土耳其的中東國家的經濟命脈，由於氣候的日益嚴重乾旱，為了爭奪水源而引起戰爭的可能性並不是一句空話。

不少築壩工程的目的在於擴大新的市場。尼泊爾王國有2200萬人口，他們是世界上最窮困的人，其中不到15%人口有能力用電。

美國「能源巨人」恩隆（Enron）國際公司已經申請許可證，去研究尼泊爾的卡納利河上建設水電廠大壩，建成後要把電力送到鄰近的印度和中國去。

現在值得可喜的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多邊金融機構對這些大壩工程表示懷疑，拒絕貸款，而寧願貸給小規模的、負面影響較少的水電工程。樂意貸款給大壩工程的都來自美國和西歐。因此，這裡的為生態運動而奮鬥的活動家們，應負起責任，促使我們的政府不把資金貸給對廣大人民有害的工程項目。

美國媒體與流行文化助長兒童暴力行為

湯姆·桑得斯

如果有誰能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資本主義體制作一次透徹研究，那麼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市的科洛姆拜中學裡新近發生的暴力事件，即14名學生和一位教師的被殺事件，就不會感到驚奇了。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大眾媒體以及其他流行文化，註定了年輕人會接受並參予反社會的暴力活

動。

有關犯罪報道——如果觸及到的是屬於一般犯罪行為，而不是大規模的集體犯罪行為——通常都是以混亂不堪的資料數據為根據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每年都有互相矛盾的政府犯罪報告而引起的。

一份報告是由聯邦調查局根據執法機關的犯罪

資料而公佈的，另一份報告是根據全國犯罪受害者的民意調查而得出的年度報告。這年度報告又依據每戶的犯罪數為基礎的資料而來。

1994年聯邦調查局的報告指出：平均每人的惡性襲擊率下降0.4%，這是近10年來第一次下降。但在同一報告中又指出平均每人的殺人率卻上升2.2%。另一份政府報告則反映出總暴力犯罪率的穩定上升——上升率為5.6%。

同樣，有更多跡象表明，在犯罪率高的地區，暴力襲擊早在30年前已經引起注意，而今天卻被當作例行公事而無人過問了。（例如駕車經過時的襲擊，打鬥而無人死傷等等）蘭夫·格羅斯曼在他的《論殺人》一書裡寫道——隱性的暴力從襲擊率表明美國人試圖相互殺害的事故，正以驚人的速率增加（見1995年波斯頓利特爾布朗公司出版的該書）。

1955年—1991年間，在15-19歲男少年中殺人犯罪率增加159%。儘管醫療技術質與量的應用標準不斷提高，但在同年齡的男少年中，引起死亡的殺人率仍居第二位，而在同年齡的黑人男少年中則位居第一。

了解了上述事實本是十分重要的，但政府與大眾媒體對於暴力犯罪行為的增加，卻提不出任何令人滿意的說明——特別是由年輕人犯下的暴力罪行。

瓦特林的著作《心靈之戰：「軍方利用與濫用心理學」一書中報道了美國政府在培訓殺人兇手時所使用的技術問題。

該書中提到納魯特博士是軍隊指揮官中的精神病學家，他談到了由他發展而成的技術，而根據這種技術，條件反射與社會學方法論可用來幫助軍方兇手克服殺人的阻力。

所用的這種方法定將暴露出「有象徵意義的典型」課題，這將涉及到「專門設計，來表明以暴力方法去殺死或殺傷那些人的影片。」

看了電影之後，觀眾心理上已感到適應了的人，終於能夠把他們的感情與現場情景分離開來。

接受培訓的人被迫在看電影時，把他們的頭部像螺釘般地栓在一塊夾板中，動也不能動，然後用一種特制的儀器，使他們不會閉上眼睛。不錯，有些影片的表現的就是現實的殺人事故，而另一些影片則達到了現實性的、高質量的特殊效果。

電影與電視卡通片

如果說我們多數人發現，這種可怕的方法被應用到17-19歲青少年軍人身上而感到毛骨悚然，那麼

為什麼我們卻容許同樣的方法在全國千百萬兒童身上出現呢？

這種方法首先應用在卡通片上，用來描寫暴力行為，然後當孩子們逐漸長大起來時，就有數不清的暴力行為出現在電視上，最終由於爭奪電視觀眾的競爭，迫使不斷地放鬆了對電視暴力行為鏡頭的限制了。

當孩子們到了一定年齡段，他們便開始到劇院去觀看電影，由於這種影片要受到PG13率的限制（在父母指導下讓孩子看電影的限制），為什麼要限制呢？因為電影映出的是被子彈射傷的流血或砍斷手腳的場面。

大約過了一年左右，大部分父母便容許孩子們觀看只有一定限制的電影，因為有更多的從人體背後爆炸子彈、流血如注和腦漿噴發的暴力場面，等等。

最後，年滿17歲的孩子便可合法地觀看R電影，而到18歲時，他們便可觀看高於R限制率的電影了。這些影片有時當軍、警特殊部隊受訓而幹出的暴力行為時，甚至放映出「摳出眼珠子，連同腦漿飛濺」的慘絕人寰的暴力場面。

因此，在17-18歲這個可塑性很強的年齡段，軍隊長期來以這種傳統方式開始給士兵們灌輸殺人的專門技術，而我們的孩子們也跟著接受軍隊訓練的非人道模式。

電影人物漢尼拔是一個食人者，以及賈森和弗雪迪，都是病態的，無疑是兇惡的，犯罪的反社會份子，他們與早一代外來的、受到誤解的美國女作家法蘭肯斯坦創造出來的怪物以及狼人等沒有任何共同之點。

現今的恐怖電影，制作得色彩逼真，可說是非常可怕的暴力行為，同時，恐怖電影會給成人觀眾們提供糖果、飲料、集體交往甚至男女間那種親暱的肉體接觸場面。這樣，這些觀眾學會了把從電影中得到的心得效益，與剛才看到的場面聯繫起來。

集體看電影的壓力是很大的，每當觀眾們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時，如果他們把視線轉移開來，就會感到丟臉出醜，甚至被人小看，因此他們中多數人從心理上要把頭牢牢地栓在一隻夾板裡似的，一動也不動，而合群的壓力使他們的眼臉永遠張開。

孩子好像「空白的政治板」

B.F.斯金納在可起作用的條件反射學中進行實驗時，否定了弗洛伊德與人性學家關於個性發展的學說，他堅持認為所有行為都是以往獎勵與懲罰的後

果。

對斯金納來說，孩子好像「空白的政治板」，只要在孩子早期適當年齡的時候，為他建立起對環境的充分監督與控制，人們要他變成什麼樣的人，他就會是什麼樣的人。

軍事部門意識到了斯金納氏的研究成果，他們不採用舊式打靶中心作為射擊目標，凡士兵在17歲到20歲之間。要他們瞄準突出在指定的射擊第一線內的人形側像開槍。他們射擊時間僅有短暫的幾秒鐘，如果他們射中了，恰好把靶心擊倒，就會得到一枚特殊獎章，通常還有三天免費通行證。

據說，這種訓練法是射擊率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2-15%，提高到現在越南戰爭的90-95%的主要原因。

今天各不同年齡的孩子們，在電視遊戲中心，站到了塑料機關槍和其他武器的背後，對準突出在電視銀屏上的電子靶心射擊，當他們壓一下電子引爆器時，武器真的搖動了，發出了槍聲，如果他們真的射中「敵人」，這「敵人」便應聲倒在地面，通常還可看見肢體與一大堆血肉在空中飛濺。

發生在電視娛樂中心的殺人行為，與軍隊裡的殺人行為之間的大區別在於：軍隊殺人要把目標對準敵人士兵，還要特別強調確保士兵行動在軍事當局的控制之下。而孩子們在電視遊戲裡所進行的戰鬥訓練，即使開槍打不中目標，也是不會受到真正制裁的。

電視遊戲機是不會出現訓練軍官來監督我們的孩子學習殺人術，這與部隊裡有訓練軍官是不一樣的。但是一當這樣的「訓練軍官」有了一次深刻的印象，並且可用來作為年輕士兵楷模作用的，那麼這些電影、電視等在其存在時間所凝聚起來的效果要遠遠超過了訓練軍官的效果。

「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

長期以來，人們早已了解到，電影通過這種楷模作用，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1917年影片《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應對三K黨的流行負責（該影片的首映是在白宮、為在弗吉尼亞州出生長大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而舉行的）。

我記得：當影片《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於1950年在德克薩斯州的拉博克城上映時，若干大型十字架僅在第二天晚上便在全城多處被人燒毀了，但只有非洲裔美國人的社區是例外。

格羅斯曼指出，一般說來，「在西方的戰爭影片和偵探影片中，只有在法律授權下，英雄們才可以殺人。如果法律不容許，他們必受懲罰。因此，

壞人永遠不會因其暴力行為而受到獎勵，反之，他會因犯罪而受到公正審判。

「道理很簡單：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犯罪得不到報酬，只能付出代價。暴力行為只能受法律的制限、受法律的指導才是允許的。英雄只有服從法律，經過法律授權下發洩他的雪恥復仇之恨，才能得到獎勵。

「這樣的英雄會得到觀眾們的認可，不論什麼時候當英雄出現時，在觀眾們當中會得到強有力的共鳴。觀眾們離開劇院時，自我感覺良好，而且意識到一個公正的法治必須存在。

「但是，今天電影只是為一類英雄們，他們的行為不受法律限制，復仇已成為老透了的、更陰暗、更返祖性、更原始的觀念，而不是法律了。這些新的反英雄派人物，被作者描繪為服從復仇之神，而不是服從法律權威，而受到激發和獎勵的。

如果說美國的警察部隊不能遏制暴力行為，而其人民卻學會了恐嚇與威脅警察，那麼其中原因卻可從娛樂界中找到。」

暴力就是國家之法

自從1941年以來，美國已受戰時經濟的統治，被捲進了「警察行動」，或這一類、那一類戰爭之中，所有這些都同它在經濟上使美國變成統治世界的大帝國有關（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帝國主義）。

總暴力和集體屠殺，不僅成為美國國家之法，而且在美國資本主義力圖征服的世界各國也成了國家之法，如同我們每天在媒體報道中所談到的一樣。在某一意義上來說，今天的美國生活可從「口袋裡裝滿一切的屠夫式生活中加以總結：「不論是非，只要在他死時，佔有大量財物，那便是勝利者」。

所有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以貪婪性為基礎，因此唯有通過暴力威脅或實際的暴力行為才能繼續存在，不斷擴大。

對於美帝國來說，為了不斷擴大，美國統治者們深知，他們必須使年輕人軍事化而不計後果（通過了更多法律，增加了警察力量，把更多人拋進了監獄、等等）

當美國生活開始分解時，如同現在正在進行中的一樣，各小集團所表現出來的暴力行為就會增加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想每一個美國人需要的是他或她可以引為自豪的社會。但這樣一個社會的到來，只有經過工人社會主義政府才可能。

（周仁生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

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納特·溫斯坦

在資產階級所有、或控制的大眾媒體那裡，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現象，早已被神祕化了。媒體對「通貨膨脹現象的消失」已發出一片讚揚聲、彷彿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了。

但是人們宣稱「通貨膨脹率已下降到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低點」，這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與此相反，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並沒有發生重大改變——儘管這現象仍被各種各樣複雜的、有些是看得見的、有些是看不見的因素的掩蓋。

例如，在倫敦出版的《經濟學人》週刊，在6月12日一期上發表的文章題為《如何對待物價下降？》，把這些經濟現象搞得混淆不清、真偽莫辨。文章作者是向資本家提出建議的，這些資本家想當然地認為「通貨膨脹了，而現在物價卻在許多行業中下降」。作者提出問題問道：「他們應當如何作出反應？」

提問題的這種方式，其言外之意就在於：長時期內通貨不斷膨脹，是正常的歷史性現象。其實這是錯誤的。事實表明：在過去60年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出現之前，長期來的傾向總是商品價值及其價格固定不變地下降。

舉個例來說，譬如今天汽車工業中的某一資本家，引進更加先進的機器，使他能比競爭對手僱用較少工人，而又能生產同樣數量的汽車，這就是說，他所生產的每一輛汽車所需的勞動時間就少得多，因此生產汽車的費用也便宜得多。

然而，代之而起的不是價格下降，而是繼續不斷地上漲！這並非由於生產費用上漲的結果，而是由於貨幣價值不斷下跌的結果。

首先，今天的貨幣並非在資本主義發展上的全過程中，都是先後一致的，也就是說，直到55年前為止。在那時以前，貨幣主要是金幣和銀幣，或者由政府發行的貨幣，這種貨幣須根據金銀重量具體規定的要求可以兌換或償還的。這種貨幣是十分可靠的價值計量單位和價格的標準，它起到了交換媒介的關鍵作用。

爲了長話短說，我們可以歸納如下，以金銀爲堅實基礎的貨幣，其最麻煩的問題就是：由於以往

貨幣把任務完成得太好了——即是說貨幣對商品價值的計量，過分嚴格了，這便使政府難以把赤字財政制度化、作爲一種機制以便緩和或穩定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繁榮與蕭條的交替循環。

半個世紀來，貨幣已經起到了很好作用，但也產生了使幣值普遍地不斷下跌的後果。因此，儘管勞動生產力提高，會減少商品的內含價值，但幣值的下跌卻作爲物價的上漲而載入史冊。

質量與價值並非同一件事

然而，猶如上文所說的一樣，當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把事情說成是通貨膨脹實質上已經消失了，則資本主義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原則就被粗暴地忽視了。

上面提到的《經濟學人》週刊，只略使一點文字欺詐術，便給通貨膨脹消失「助」上一臂之力，文章說：「官方數字過分誇大了通貨膨脹，因爲他們不容許商品質量和服務得到充分改進。」

這樣的表述，其言外之意是質量和價值是同一件事，其實這是蓄意歪曲，是把商品生產和交換法則披上件神祕外衣。

有人把質量的提高，故意說成是商品有了更大價值，因而購買者所得到的交換價值要比他們自身可能實現的還要高。這實在是在出賣筆桿子的不誠實者手裡，玩弄曖昧詞句的把戲。

在通常使用中，產品「質量」一詞，譬如說汽車質量好，就會有價值高的意思——如同在實際事例中，一輛福特牌轎車，裝備有自動傳送器與其他額外附件，便是高質量，因而比之一輛沒有任何額外附件的福特牌小型汽車來，就更加貴重了。

然而，在下列情況下，譬如今年福特牌轎車的新型號，以較好功能和較好設計部件來取代去年舊型號的不良功能和較差設計部件，如果說，今年型號比去年型號有較高質量，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換句話說，在這種特定情況下，質量雖有所增加，而其他一切仍然是相同的，只要生產較好質量部件時不必增加成本，那麼其價值也就沒有增加。

因此，斷言「官方數字過分誇大了通貨膨脹，

因為他們不容許商品質量和服務得到充分改進」，這是扭曲邏輯的典型例子，其本意在於誤導讀者並縮小真實的通貨膨脹率。為什麼要低估這膨脹率

為什麼有些官方統計學家如此有意識地低估真實通貨膨脹率呢？有兩個主要理由：

· 其一，有意偏視：資本主義的統計學家們，正是通過有系統、有步驟地低估通貨膨脹率，以便設法削減人們為償付物價上漲而提出增加工資的正義要求。如果統計學家能夠說服一部分工人及其在全國總人口中的同盟者和友好者，認定通貨膨脹率確是低的，那麼在這些受欺騙者的眼裡，也就認為他們要求的正義性便縮小了，甚至消失了。

與此同時，在最近幾十年中，實際工資已經下降了大約一半，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一個相當重要跡象可以證明的實際工資已下降到上述水平的，就存在於有文件根據的事實中，即直到60年代末為止，其標準是：一個工資勞動者能夠維持平均為4口人的工人階級的家庭。但現在則至少需要兩個工資勞動者才能維持平均為同樣人口的家庭生活，這個新的標準便可以用來證實，實際工資下降了一半左右。

然而，不必大驚小怪，因為那些無法否認這個否認不了的事實的資本主義宣傳家們以及大多數其他群眾出版物，卻把實際工資降低輕描淡寫化了。他們爭辯說，今天平均每個工人的生活水平，按其所增添的生活上奢侈品，已經大大地富有化了，例如工人家庭已有了過去從未享受過的電視機、計算機以及無線電話等等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中。

資產階級出版界辯道，60年代每一工人階級的家庭，可能有一台小型的黑白電視機與電話機，但可以沒有計算機或無線電話。但今天同樣的家庭就可能有兩台彩色電視機以及無線電話和計算機了。

但這個論據和其他論據一樣，都是虛偽的。事實是：生產率的不斷提高，降低了一切產品的價值，而這一切產品就成為今天可以滿意的的生活水平組成部分。每樣產品造價便宜，還可從較少工業勞動力生產更多產品（包括新型的有用產品）中反映出來。

再說，一個工人認為可以滿意的生活水平是在不斷變化中的，猶如對世界上的每一產品一樣。結果是：30年或100年前工人們認為可以滿意的生活水平，到了今天往往會認為是不滿意的了。

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基本生活水平與過去令人滿意的生活水平作一比較，譬如冷一熱自來水、抽水馬桶和中央供暖裝置等，在1899年那時的絕大多數

美國工人看來，簡直是只宜於一個國王才能使用的奢侈品。但今天的工人如沒有了這些物品，即使說輕一點，也必引起非常嚴重的後果。

換言之，社會生產率的增長、人民需求願望的增長，是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成正比例的，而當社會生產率增長並生產出如此豐富的人民所需求的物品時，如果又拒絕把這些物品供應他們，這對每一個人來說，這是一種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不公平行為。

債務堆積成山

· 其二：為什麼統治階級要低估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終得誘發和滋長通貨膨脹的內在勢力、仍在繼續不斷地上升到過去少見的持續高度，甚至有達到爆度程度的危險。

受到過分重視的東南亞幣值的暴跌，已在世界上掀起波瀾，這對於貧窮國家的普通人民來說是個悲劇，而對於世界上先進工業國來說，這是即將來到的一個可怕預兆。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負有保持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平衡責任的人們，例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董事長艾倫·格林斯潘等之所以引起害怕的理由，他們害怕失去對通貨膨脹的控制，更甚於害怕另一次經濟大蕭條的爆發。

但與此同時，這種毫無根據聲稱通貨膨脹消退了的說法，其主要目的要歸罪於受到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的受害者，因為他們為了要追上物價飛漲而不得不投入為增加工資的狂熱活動。全世界的艾倫·格林斯潘們終得：當上述情況發生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工人們全力以赴地進行鬥爭，免使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

在這樣通貨膨脹時期內，自然會掀起如跟上物價飛漲而爭取增加工資的罷工浪潮。然而較可靠的作法是預先斷言：在這樣通貨膨脹不斷上升時期，不論工資的增加能否爭得，物價將繼續不斷地上漲。

為什麼呢？只因為在約翰·梭納德·凱恩斯學說盛行的資本主義世界裡，物價上漲僅僅是幣值下降的反映。但當危機襲來時，統治階級將在他們的出版物和電子通訊媒體上猛烈抨擊這種理論：他們說工資增加才引起物價上漲。

事件發展進程就可證明本文的論點，如同一句俗話所說的：「警惕即警備。」

（周仁生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

美共和中共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困誤

趙京

三月十七日上午，我趕去奧克蘭Oakland 的Niebyl-Proctor 馬克思主義圖書館參加由社會主義者Ann Robertson 女士講解的“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座談會。她主要是根據自己2003年寫成的“馬克思與巴枯寧衝突的哲學根源”小冊子展開，開首以在美國校園中流行的“喬姆斯基熱”為例說明美國的年輕人受喬姆斯基影響之膚淺，進一步介紹馬克思對巴枯寧的批判。約有二十人參加了座談（幾乎都是白人，這使我感到有點意外，因為奧克蘭是美國黑人政治中心之一），除了與圖書館相關的美國共產黨同情分子，有半數是接近無政府主義的人士。多數發言人的意見如下：(1)目前情況下，無政府主義傾向影響青年參加反戰等運動，是可喜、難得的，不僅馬克思的理論無所謂，如果再象第一國際或西班牙內戰中那樣爭奪領導權，最終都會失敗；(2)巴枯寧在理論上並不是無政府主義的突出代表，蒲魯東的思想更深刻一些；(3)我介紹自己在最後逃離日本時，鬆散的3A(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亞洲無政府主義聯盟)曾經開會決定，終止一切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毛”論爭，共同鬥爭，這引起與眾多數人的贊同。在州立大學教哲學的Robertson女士面對這樣的結果有點狼狽，承認還要學習，又說她還有事就提前離會了。（我後來注意到她在停車處與美共的一個活動分子談了很久。）

我第一次決定參加由美國共產黨主辦的活動，有一定的猶豫。因為我自從到美國來，雖然參加過十多個社會主義·和平·進步組織，目前仍然是勞動黨成員，但對美共一直敬而遠之。這一方面是因為不贊同其理論，粗知一些其內部鬥爭醜聞；另一方面也不想再在聯邦調查局FBI和移民局CIS收集我的一大迭材料中再加上一份麻煩證據。但我這次終於決定造訪此地，乃是受到D.E律師邀請，為一個“不速之客”（中國共產黨中央編譯局代表團）當翻譯，一舉兩得，實地考察美共和中共的理論邏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下午召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展望和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度的影響”會有六位編譯局和六位美共的人士發言。中共人士主要是介紹中國的情況，以“政府仍然佔有多數經濟體”的資料來證明中國的經濟仍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也附帶統戰宣傳，說西方的右翼抹黑中國、左翼不理解中國。我因為被當作美共的翻譯，不便發表意見，只能在結束時提出主要觀點：政府、政黨（特別是一黨專制下的政

黨）控制的經濟並不等於公有制，沒有新聞自由、政黨自由的政治制度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體制實際上更接近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

美共人士的代表是美共“學術委員會”的負責人Erwin Marquit，他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當我介紹自己原是物理系學生、是從日本逃來的政治難民時，他說他是逃離納粹的政治難民。一位女士推崇史達林的“經濟理論”使我感到可笑，她承認“史達林也有錯誤”，我只好附和說“史達林也有功勞”。另一位女士介紹了美共代表團前不久訪中的觀感。另一位教授宣讀“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文。我對這些出於狹隘信條論述他們並不知道的中國沒有任何評論。最後，我的朋友D.E律師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陷入困境的社會主義”來自我辯解中國是不是還要搞社會主義。雖然他的切身觀察已經告訴他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他的感情必須支援他的“中國是社會主義”的信條。我們在三藩市的反戰遊行中相識，我知道，這位在越戰時期投身越共抗擊美帝國主義的老戰士不可能沒有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祖國”的支持來抗衡美帝國主義。他呼籲美國人民在他預感的即將到來的“美日同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衝突中以生命保衛中國、打倒美·日帝國主義。我對日本、美國左翼朋友的這些感情、心理、精神狀態見識不少，學會了不以他們的各種荒唐邏輯來嘲笑他們，而是以他們的人生經歷來尊重他們。毫無疑問，那些真正獻身本國民眾反抗自身國度政權的西方人士在真正認識中國之後，會站到中國民眾一邊的。

最後，如果要以一個共同點來結論的話，那就是那位中共中央編譯局負責人的斷言：“中國人民大多數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價值，拋棄這些價值的政府就會被推翻。”這實際上也是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危機：中共的“三個代表”（姑稱之為“理論”）、一黨專制的統治，市場經濟的實際運行（在奧克蘭幾十公里以南的矽谷每天可以看到最發達的中國資本主義實踐），以及外交上的出賣（例如勾結日本政權迫害中國公民的罪行），把社會主義真正的價值（民主、人權、平等、自由等）踐踏得一錢不值。失去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會維持下去嗎？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會維持多久呢？

[2007年3月20日於美國]

超達爾文主義者，你們走得太遠了！

克利夫·科納

物競天擇，是查爾斯·達爾文進化論學說的核心，但幾乎沒有別的學說，能像達爾文學說這樣會引起更持久的思想論戰，1859年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便提出這個學說。

儘管達爾文本人心中也明白，由於他在生物學上所作的貢獻因而帶來頗有權威性的實質意義，必將影響到人類所關心的其他領域——特別是宗教領域——但是他無法預見到在多大程度上會動搖人們對人類社會的思考。

卡爾·馬克思很快就認識到，達爾文的觀點對於社會學說是具有革命意義的。當《物種起源》一書出版後不久，馬克思便興高采烈地給恩格斯寫道：「這本書，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

按照馬克思的看法，達爾文提出用令人信服的唯物主義論點來解釋生存的有機動為何會在漫長時間內發生變化，這就把人類歷史範圍引進自然領域的研究中去了。

馬克思因此從達爾文學說裡，找到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強有力論證，而辯證唯物主義則是形成他自己的社會革命學說的基礎。

正當馬克思從達爾文主義中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時，親資本主義的社會理論家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尤其是赫伯特·斯賓塞，成為煽惑人們的著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的主要辯護人，按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說法，達爾文的「適者生存」這個法則，不僅在生物進化中，而且還在人類社會中發揮作用。

社會達爾文主義所發展了的論點是：在一切可能的經濟體制中，唯有自由的資本主義是最合於「自然法則」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由於他們具有天然的優越性，而窮人之所以窮苦，是由於他們生來就缺乏才能，而才能則是通向經濟成就的必經之路。

有些資產階級理論家竟然認為，讓窮人餓死，則是淘汰劣等人的「自然道路」，也是使人種經過長時

間的進化而得到改善所必需的道路。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很惡毒的方式建議道：讓窮人死去，而不是通過個人慈善行為或國家福利計劃去幫助他們活下去，是最有利於人類的事業。

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成了法西斯理論的主要來源。二次大戰前以及二次大戰期間，法西斯政權把這種理論應用在歐洲，其實踐的恐怖後果，已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聲譽喪盡。

然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應聲蟲們還在堅持他們的主張，不時地浮出面上來。例如，在辯論依靠社會福利而生存的婦女，是否應當強迫他們接受絕育的問題上，就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餘音繚繞。



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到社會生物學

與此同時，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在支持提出反動政治課題的運用方面，起到了鼓勵作用。最近幾十年中，最突出的政治課題之一是「社會生物學」理論，這種理論助長了一種思想，即人類社會行為基本上是繼承特性的產物。

如果母愛、溫順聽話、侵略、智慧、犯罪行為等屬性，都是由遺傳基因決定的話，則個人的社會作用

生來就已固定下來，很像工蟻和蜂后的作用一樣了。

這樣的論調還常常被用來為教育政策辯護，這種政策規定，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注定要被送到劣等學校去學習，理由是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工人家庭的子女，沒有能力取得重大學術知識的成就。社會生物學的另一個含義是「生物學決定了婦女命運」，女權主義者運動已經對此作出了強有力的抗議，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嚴重地損害了婦女的利益。

另一方面，遺傳基因決定智力的觀念，得出的必然結果是，非洲後裔的美國人永遠是低級智力的一——這種既惡毒又虛偽的觀念，已經受到徹底地駁斥，但似乎還沒有完全消失。

「達爾文的危險概念」

最近，在對哲學家丹尼特的書《達爾文的危險概念》進行辯論時，一種有關濫用達爾文主義的，儘管是更為巧妙的表現，浮出面上來了。

丹尼特用了大量篇幅，來攻擊著名的生物學家、古生物學家古爾德的著作。古爾德在《紐約書評》雜誌上，寫了兩篇長文章反駁丹尼特的攻擊。古爾德在指控時提出：這次爭論並非象牙塔裡的事，而且帶有強烈的政治弦外之音，丹尼特爭論策略的武庫中，包含有給對方扣上一頂紅帽子。

在這次有關達爾文主義的辯論中，政治問題佔據著什麼位置呢？

丹尼特公開表明：「古爾德發動一場戰役，反對特定科學家，反對科學領域內的特定思想學派……採用了十分明確的政治術語，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措詞。」

丹尼特攻擊說：古爾德的非漸進主義的進化觀（或稱斷續性平衡），源於馬克思主義者對古生物學上起作用的改良的反感，誠如大家所知道的，改良者是革命者的最兇惡敵人。

最後，丹尼特（Dennett）報道說：1992年，古爾德「從訪問俄羅斯歸來之後，」又一次指出「在漸變的改良與突變的革命之間是有區別的」。他並說：「馬克思關於大規模突變模式的有效性已經被證明為是正確的。」

丹尼特作這樣報道的潛在動機，是想把古爾德描

繪為他的科學判斷已經蒙上一層理論偏見的思想家，並暗示在達爾文主義討論中，馬克思已失去合法的地位了。

在檢到正在爭論中的「超達爾文主義」這一問題之前，先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對古爾德在進化論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影響力是頗有意義的。

斷續性平衡理論

1972年，古爾德與他的同事奈爾斯·埃爾德里奇（Niles Eldredge）發表一篇論文，題為《斷續性平衡理論：取代物種漸進主義的新途徑》他們建設標準的達爾文進化論模式需要修正。達爾文及其追隨者向來認為，新的物種的發展，要通過一個漸進而又均勻劃一的演變過程。

必須強調的是：漸進主義者的論斷，並非從自然現象中得出的推論，而是一種理論的構想，這是很明顯的，而構想很少給予進一步的考慮。但實際上，進化的最初自然現象——按時間序列保存在地質層裡的化石形式記錄——不會提供漸變的畫面。

化石形式記錄，是由一系列各自不同的物種組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中斷或缺，幾乎沒有中間性的生命形式來填補。在古爾德與埃爾德里奇以前的進化論者，一貫相信，化石形式記錄中的中斷或缺，只不過是表明其不完全性——已知物種之間「失去的環節」肯定是存在的，但沒有以化石形式保存下來，或尚未發掘出來。

然而，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得出相反的論斷：化石形式記錄是相當精確地反映出實際出現過的進化過程。他們主張，物種形成不是緩慢地進行的行動。

他們斷言，有機物群體在很長時間內總是保持穩定的，直到經受一次向不同種類的有機物快速轉變時，穩定便失去了（這也許是受到環境改變的刺激而發生）。這些轉變並非像以前人們所認為的需要幾百萬年，可能只需要若干千年——若干千年，從地質學的時間尺度來衡量，僅等於一眨眼之間。

按照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的看法，生存著的有機物群體的典型史，也就是長時期平衡史，這平衡被新物種形成的急變事件所中斷。

任何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一般法則的人，將會很快承認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的學說，是同辯證唯物主義相適應、相符合的。兩人對變的概念都認為是以「質的飛躍」形式出現的。

人們可以推測，斷續性平衡理論，是源於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啓發的一種見解。丹尼特，一再重複古爾德的早期批評家說過的話，對古爾德提出懷疑，並利用來作為論戰時攻擊的大棒。古爾德這樣做，實際上已毫無根據地任意作出結論，即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結論。

先驗論方法

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生物學上去調查研究問題，通常有兩種方法，即正統的和非正統的。丹尼特認定古爾德所採取的就是非正統的方法，說他把辯證唯物主義原則當做一整套不可違反的原則，生物學（或任何其他科學）的一切細節都可以根據這整套原則推導出來的。

很早以來，這種方法被稱為先驗論方法，事實上，這與馬克思主義正好是對立的，因為先驗論是以唯心主義而不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先驗論試圖運用推理，而不是運用系統觀察或實驗來發現物質世界的運作，這就是認識先於物質了。

有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家，確曾試圖利用辯論主義作為一套「首要原則」，根據這首要原則可以推論出物質世界的運作。這在蘇聯斯大林時代最為普遍，那時，許多罪行都是借用馬克思主義名義而犯下的。

最驚人的例子便是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手下人，他宣稱：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已經推導出植物遺傳法則，從而得出荒謬的結論，造成極其慘痛的社會後果。

但古爾德的方法，與先驗論是完全相反的，他不應該對斯大林主義的御用文人所犯下的罪行，負有任何責任。他的方法是正統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理解世界的總框架來使用——不僅可適用於人類社會，而且也可適用於自然界。

由於古爾德熟悉馬克思的理論，因此他已注意到

人類社會變革的模式（革命爆炸性與表面穩定時期的相互區分）同呈現在化石形式記錄中物種進化模式之間的對比。

然而，古爾德從未想到過，要去宣佈新的真理的發現，說這發現是通過一套抽象觀念的推導而得證明的。古爾德所做的只是提出新的假說，這假說的概念不可能出現在達爾文及大多數非馬克思主義者生物學家的頭腦中，因為他們的社會條件預先決定了他們只能作出漸變的論斷。

25 年前，當古爾德和埃爾德里奇的觀點公佈之後，他們受到大多數同事的抵制。這種經得起客觀事物檢驗的成就，在今天來說幾乎沒有爭議了，但仍有他們的反對者，不過信奉這種理論的信徒的人數遠遠超過反對者。

當繼續性平衡理論，尚未達到無法挑戰的「科學事實」的地位時，卻被吸收到正統進化論的框架中去了。但不管如何，斷續性平衡論全面地提供了一個傑出的實例，說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如何能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

「簡化法」（歸納法）與「逐步解決法」（Reductionism and Algorithm）

儘管丹尼特明確地把他自己與反動的社會生物學概念區分開來，他對「達爾文的危險理論」的中心論點構成一道防線為他的基本前提辯護：即大量人類的行為，包括社會行為在內，都可以歸入到我們遺傳基因的範圍之內。

丹尼特將其歸屬於達爾文的「危險概念」（顯然是挖苦的話），就是物競天擇的進化論。他相信，這是「任何人都曾有過的唯一的最佳概念」。

對於那些感受到達爾文學說威脅的人們來說，這學說就具有危險性，這威脅表現在無情地排除一切，連神聖這一個詞也在排除之列了。正確地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達爾文學說不僅徹底摧毀了傳統的上帝觀念，而且也摧毀了超自然的創造論，不管這種創造論的解釋是何等的強詞奪理，牽強附會。

達爾文的「危險概念」告訴我們，沒有任何最高智慧監視著我們，沒有任何成為理論與道德源泉的無

限智慧，也沒有任何宇宙意識或宇宙方案會給人類生活帶來更大的意義。

丹尼特對於達爾文主義的唯物主義內容的詮釋是精采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他在解釋「物競天擇」（即自然選擇）時，借用電腦技術中的一個比喻。他說：「達爾文發現了逐步解決法的動力」。

達爾文的危險概念就體現在：逐步解決法是最好標尺，解釋羚羊的步速，鷹的翅膀，蘭花的形態，物種的多樣化，自然界的一切奇跡……

不管因逐步解決法所得到的產物多麼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基本過程，除了在沒有任何智慧監督的幫助下，一系列獨立的無意識的一步接一步之外，就別無其他了。

上述這段話中，「除……外，就別無其他了」，正是簡化法（歸納法）方法論上錯誤的象徵——把極端複雜的自然現象，簡化為除綜合少數簡單的因素或過程之外就別無其他，這種企圖是絕無效果的。

古爾德及其他生物學家力圖向丹尼特說明這個問題，但丹尼特置他們的異議於不顧。他甚至說「簡化法這個術語被濫用了」，簡化法是沒有固定意義的。

儘管丹尼特加以否認，但簡化法或歸納法是確有其意義的，他的觀點——集中地體現在他所說的「生物學就是工程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最普通的簡化法形式，就是試圖把在自然界一個領域中已被證明為有效的科學法則，應用到尚未得到證實的領域中去。例如化學法則已經成功地被推廣應用到生物學的研究中，形成了份子生物學的雜交體系中。

然而科學史上對歸納法所作的種種的努力，也常常出現過失敗，例如要把古典牛頓物理學定律推廣應用到亞原子物理學上，便是失敗的例子。

丹尼特把達爾文的正確學說推到太遠了。古爾德說：「當把有效的原則變成了中心教條主義時，丹尼特實際上已發展了「達爾文原教旨主義」或「超達爾文主義」，也就歪曲了達爾文學說，使之成為一幅諷刺畫。

古爾德將「物競天擇」作「至高無上原則」接受下來的，但他補充說，「還必須引用一系列附加法則

以及不可預測的歷史偶然性的巨大作用，來解釋生命進化道路的模式和規律性。」

打破丹尼特簡化論計劃的範例，就是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的斷續性平衡理論。因為單用「物競天擇」，還不能充份說明問題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丹尼特要貶低「斷續性平衡」，認為把非正統的馬克思理論偷運到科學中來。

丹尼特相信：唯一可以代替「物競天擇」來說明進化演變，就是乞求超自然的力。然而，古爾德要我們深信，他所引的「附加法則」像「物競天擇」本身一樣，是無人指導的，無目的的唯物主義——但所有的「附加法則」都各自在發揮作用。

超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主義者反對達爾文本人說過的話。達爾文不止一次地說：我堅信物競天擇這個原則，是生物變異的主要手段，而不是絕對手段。（著重點由本文作者添加的）

當然，引證達爾文的話，並不能解決科學上的爭論；因為達爾文主義所包含的一整套概念，也在演變和發展中，如同有關「漸進主義」的爭論所表明的一樣。丹尼特和古爾德兩人論點的相對價值，最終須取決於物質的證明。要評價這物質證明，首先必須考慮適應論者的推理在達到科學結論過程中的地位。

適應論者的「假設故事」

有一種信念認為：每一生物的每一特徵——從單細胞有機物的膜直到人腦——都是物競天擇的產品，但這一信念有其必然的推理後果，這就是：這樣的一種特徵代表著一種適應性，這一適應性是為有機物在為生存而鬥爭的、某一有用目的而服務的。

因此，超達爾文主義者的綱領，就需要提出並發展表面上看似有理的適應論的解釋，即解釋無明顯適應性價值的動植物器官的起源。

這種努力有時所帶來的只是自我諷刺而已；在拙劣的模仿中，更可笑的是這樣一種解釋，它認為：人的鼻子也是一種適應作用，人鼻的進化給我們提供了可以安放眼鏡的位置。

適應論者的解釋，通常是帶有想象性的，十分有趣的，而且由於物競天擇畢竟是進化論的「至高無上原則」，因此，多數解釋已被證明是可以成立的，但不管怎麼說，這些解釋只能表明為科學探索中的推理方式，而不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方式。

從最壞的方面來看，適應論者的解釋只能像基普林（Kipling）的假設故事那樣的富有幻想（《豹斑是怎樣獲得的》）。從最好的方面來看，這種解釋的價值是導向深入研究的一個假設。

檢驗超達爾文主義信條的一個辦法，就是要看：不為適應性目的服務的那些持久性變化，是否得以證明已在有機物的群體中發生過。古爾德列舉了具有這樣變化的若干種類，並給每一種類提出特殊的實例。

最重要的一類也許就是：它的變化是作為其他變化的「非適應性的次要結果或副作用。」（達爾文稱此為「生長的聯繫性」）

古爾德解釋說：各個有機物的進化「是以複雜的、相互聯繫的整體出現，而不是以各個分離部分的鬆散結合而出現的，根據物競天擇的原則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此外，任一適應性變化，必定也會產生一系列……非適應性的副產品」

他舉出一個例子——這是無窮數目中可以選擇出來當作例子的一個——這例子是關於蝸牛的臍孔，臍孔是一個虛空的圓筒形空間，這空間是蝸牛在構築它們的貝殼過程中形成的。

有些蝸牛類，利用臍孔作為貯存蝸牛蛋的場所。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一職能並不是作為改善蝸牛繁殖系統的適應性而發生，而是作為構築蝸牛貝殼的次要結果而發生的。

古爾德補充說：如果有什麼器官是完全以非適應性副產品而形成的，那麼「人腦就是最有代表性可以用來說明這個問題的器官——這便使得適應主義成為人的行為的一種，特別值得懷疑的方法……物競天擇使人腦逐漸變大，但是我們人的大部份思維特性及其潛力卻可能是——非適應性的次要結果，也就是說在形成具有如此結構複雜性的器官時，所帶來的非適應性的次要結果了。」

不錯，這就是把適應主義論者的解釋應用在人類

文化發展上，使得超達爾文主義者的歸納主義，或簡化主義顯得貧乏不堪，那是最明顯不過了。

按照丹尼特的說法，「人類文化的一切成就——語言、藝術、宗教、倫理學以及科學本身——都跟細菌、哺乳動物以及人類的形成一樣，是屬於同一基本過程的人為現象。」這個形成過程，當然也就是屬於……物競天擇的不容改變的、不斷上升的計算系統了。但正像丹尼特曾經振振有詞地解釋過一樣，物競天擇是一種盲目的、無意識的，無目的的過程。

人類社會的發展——或者說「文明的進化」——是由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原則起作用的結果。科技進步，社會實踐以及其他形式的人類經驗並非通過基因密碼而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是從父輩、教師有目的地轉移給孩子們的。

使現代人類與史前穴居人區分開來的那些不同方面，並非物競天擇的產物，而是人為的或有目的選擇的產物。正如古爾德所指出的，文明進化的「有方向性」或「有目的性」的性質，使文明進化極其迅速地向前推進，結果把物競天擇的緩慢過程，作為影響人類歷史的因素，減小到成為毫無意義的事了。

古爾德說：「我深信，如果把生物進化同人類文明或科技發展兩者拿來作類比或對照，所造成的害處遠遠超過益處。」

丹尼特的超達爾文主義是基因決定論的變體，基因決定論，不管有意或無意，實際上是打開了通向社會生物學各種反動含義的大門。

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在一直在反對種種意圖：即把社會學的法則降低為心理學或生物學的法則上去，這樣做，實際上就是鼓勵有害社會政策的有害科學。

古爾德反駁了丹尼特的意圖，因為丹尼特企圖「把物競天擇這一普遍的酸性藥應用到把人類文明發展降低為達爾文的計算系統，這就是這一場鬥爭的新一輪回合。

（周仁生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

晚風吹來憶往昔 林松祺——我的帶路人 周仁生

林松祺，又名林逸白，化名宋直。生於 1920 年，卒於 1955 年。浙江樂清烏牛人。少時，家境清寒，世代務農，祖父及父親粗識字，信天主教。

我認識他時，已是 1936 年，正值抗戰前夕。據他告訴我，在溫州九小（後改名康清小學，現在是瓦市小學）讀書時，家庭無力負擔學費、膳宿費，只好在周宅祠巷附近的天主教堂裏寄宿，由於是教友家庭，也得到天主教一點幫助，解決部分費用。實際上，他能在康樂小學一直讀到畢業，全靠兩位傾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教師的大力支援。一位是潘泰運，另一位是李察志。從此，他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思想。

1936 年春，他考進省立溫州中學初中部；1939 年春，他進溫中高中部，1942 年春畢業；他在溫州中學先後讀了六年書，母校的事事物物，在他的腦海裏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在溫中讀書時，品學兼優，名列前茅。主編過溫中校刊，出版“細流”牆報，主持過民眾夜校，推選為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成員之一。校內與他旦夕相處同學有章宏業（即章濤，江濤），洪秀榮，曾昌勛等，前兩人成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骨幹分子，而曾昌勛是他的好友，同情者。1940 年，溫中遷校青田已一年餘，來了一位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師安明波，成了我們最親近的老師。我和松祺此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生活道路，都是與安明波先生甘苦與共，休戚相關，這是後話。抗戰時間，松祺參加了溫州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所領導的外圍團體——救亡大同盟。他擔任溫中該團體的主要負責人，與他接近的溫州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有曾猛、王國龍、錢川、黃禹石等。松祺在此期間自然成為溫中托派學生的領袖，因此與中共領導的學生領袖之間成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思想體系，兩股不同勢力的代表人物。抗戰期間，我們的口號是支持國民黨抗戰，只要蔣介石抗戰一天，我們就支持他，但決不與他談統一戰線，這是與中共不同的。我們對中共的統一戰線持批評態度。松祺在抗戰八年中始終忠於這個口號，執行這條路線。這樣勢必與中共學生意見分歧，也就避免不了爭論。他在爭論中，以理服人，但堅決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反對一國社會主義，反對斯大林的罪惡統治。今天蘇聯解體，東歐變色，恰好證明了松祺幾十年前就堅持的信念，是經得住歷史的考驗。也只有我們才有發言權。

1941 年秋，我考進浙江大學龍泉分校，1942 年

秋，松祺也考進龍泉分校。同時，考進的還有章宏業、洪秀榮，我們四人旦夕相處，思想上，感情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去浙大分校之前，除洪之外，我們三人曾在溫州府前街模範小學教過幾個月的書。模範小學校長，前是余立天，後是黃禹石。模範小學師生中間，正因為有此一段歷史關係，留下托洛茨基主義的種子，這批種子發芽滋長，培養出數十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學生領袖。

松祺在浙大龍泉分校讀書時間不長，從 1942 年秋天末進去，1943 年秋出來，前後僅一年時間。這一年我們主要是在安明波先生指導下走過來的。安先生此時已從溫中辭退，受聘為浙大龍泉分校，任經濟學教授。安先生勉勵我們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閱讀中外歷史、政治經濟學、哲學（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們的著作），那時，我們年輕，精力充沛，所以如饑如渴地博覽群書。我們還關心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常在安先生家裏召開時事討論會，舉行座談。參加的人不僅有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還有少數幾個靠近中共的人，也有政治立場並不鮮明的人。松祺是很積極的，富有熱情。他同我一起共同寫作，共同翻譯，廣結朋友。如果說往後幾年，浙大總校、分校曾經出現過一個規模不大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那就應該說，運動的根子就在浙大龍泉分校。

不幸的是，1943 年春初，松祺的健康發生了變化，他的神經衰弱症逐漸嚴重起來，思想顧慮多了，精神負擔重了，這就妨礙了他的積極性。究其原因，還是家庭包袱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家中還有父親和一個年幼的弟弟，收入微薄，生活困難。雖說我們在浙大讀書，都是公費生，膳食不愁，但總得有一點其他費用，同學之間的互助不在言下的，但他本人總是憂心忡忡。1943 年秋上學時，就繼續升學或停學問題，他躊躇不決，反復再三。結果我們七八個人同坐一條小木船，從溫州西門碼頭出發，到了青田縣，他就毅然隻身一人離開我們去教書了。

回想浙大這一年，儘管松祺後期身體虛弱，心境不暢，但他與我的友情是更加深厚了。1936 年我開始認識他，到了 1943 年已有 6、7 年歷史。但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對我的影響最大，莫過於模範小學的幾個月和浙大的一年。是他，給了政治上的啟蒙思想；是他，使我從埋頭讀書，而走向認識社會，理解人生；是他，帶給我托洛茨基主義；是他，使我結識了中國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資深領導人彭述之、劉家良，溫州的王國龍、王禹石；是他，第一次給我談起蘇聯的托洛茨基，中國的陳獨秀。從那以後，我就跟他們共吸呼，同命運。有人曾經問我，你對林松祺有甚麼感想嗎？這意思是，你要埋怨，還是別的甚麼呢？這就使我聯想起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另一位資深領導人鄭超麟的話了。那是 1965 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們都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裏。陳獨秀時代的省委書記，彭述之、鄭超麟的戰友尹寬也關在那裏。一天，尹寬因病保外就醫，上海監獄的負責人請來上海市公安局的兩位處長，然後把我們十多個階下囚集中起來，要尹寬談談保外就醫的感想。尹寬干脆得很，講了一兩分鐘話，原話大意是：毛澤東搞農村包圍城市，成功了。我們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錯了。但我今天有機會回家，你們也會有這一天的。”之後，監獄長要我們談談感想，鄭超麟是最後一個發言。他說：“尹寬把我引向中國共產黨，又把我引向托洛茨基主義——左派反對派，那麼，我該埋怨他，還是感謝他呢？我考慮了之後，還是應該感謝他。”鄭超麟的這番話，也正是我對松祺該說的話：我應該感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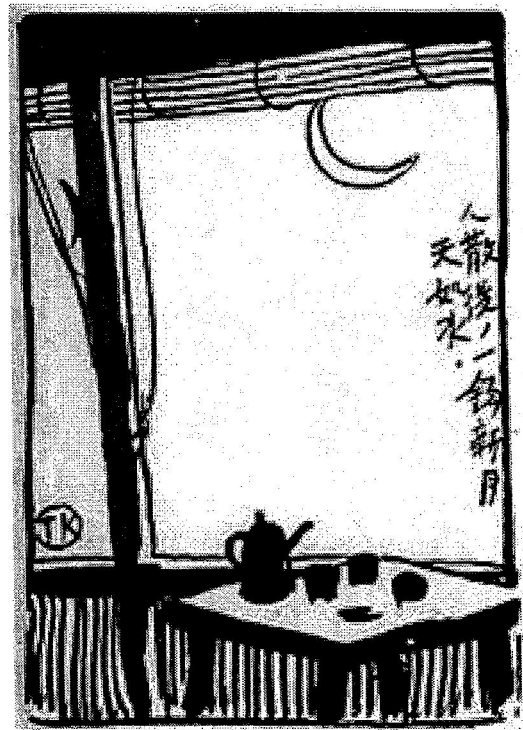
1943 年秋，他離開我們之後，便留在青田縣，經人介紹，在青田縣城教書。1944 年春，直到 1945 年夏，他轉到雁蕩山靈岩寺的樂清師範學校執教，此時與他最接近的是浙大龍泉分校教授，中國著名詞人夏承燾。夏先生是避難來到樂清的。夏先生十分愛惜松祺的文才，松祺也非常愛戴夏先生。他對我說，夏先生臥室裏掛的那幅親筆寫的對聯，一直鼓勵著他另找人生樂趣。這對聯是“房櫳雖小天地大，不足回旋睡有餘。”夏先生是一位好人，學識淵博，執中國詞壇牛耳，吸引力很強，這就在松祺的世界觀裏，打開另一扇窗口。

1945 年秋，巧合的是，我從浙江省立第三臨時中學，松祺從樂清師範，分別應聘到位於鄭樓的溫州師範執教。我教歷史、英語；他教語文。同時應聘到溫師執教的，還有我們自己人錢思敬和梁庭。梁是中國托派領袖之一劉家良的妻子。

兩年闊別，一旦在鄭樓重逢，彼此間內心喜悅的“青枝綠葉，郁郁葱葱；鄭樓的夜景、月色；溫師後院沿河的綠柳垂楊，都會令人觸景生情。這時，抗戰結束了，時局未定。國共兩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我們的人，本來各處一方，現在都向上海集中了。《求真》、《新旗》、《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三個刊物也相繼面世。這時候，我們曾經設想，我們的事業正在迎朝霞、舞彩虹，會像春雷般地震撼長空。但是，不容諱言，松祺卻有另一種心態。他對現實生活，個

人婚姻、家庭、父親、弟弟、未來，想多了。對打開社會關係，擴大我們的隊伍；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共產主義事業，想少了。夏先生無意中給他啓開的那扇窗口卻是陣陣清風向他撲來。

夜深，我與他坐在一起，有時也有思敬在旁，當然是無話不談。他的話題總是轉向生活，自然也流露出：“我們太苦了，前途茫茫。”如果把此時的思敬拿來與松祺作一對比，前者是積極、樂觀、虎虎有生氣；而後者則是棉花一團，懶洋洋、軟綿綿。此時，我為我們的好友擔心，為他的“轉變”而感到無比驚異。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他失望過。在他短暫的三十五後生命史中，這是一段令人傷心的插曲。



值得提一筆的是，他後來的女友，應該說是戀人唐玉蓮，就是他在樂清師範時的學生，1945 年秋季也轉學到溫州師範了。他們兩人相愛甚深，心心相印，但是歷史命運註定了，他倆始終沒有成婚。“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這是中國人的佳句，也許可以適用於許多人，但還需要指出，著重點是個“願”字。至於我們許多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這只能是一個諷刺。松祺如此，宏業如此，熊安東，楊博，我的學生胡振東也都如此……。

在溫師半年，鄭樓的土壤裏，長出了我們的花朵。白素冰就是一個。後來在上海期間，宏業、松祺都幫助她提高認識，使她成為中國女托洛茨基主義者中的出色人物。

離開溫師之後，松祺逐漸振作起來。他雖然仍懷

念夏承燾，但已身不由己地把人生的航向撥回到宏業和我這邊來。他重讀馬、恩、列、托的書，走陳、彭的路。1946年春，在永嘉濟時中學一邊教書，一邊準備到上海去——這是中國工人階級開革命的發祥地啊！他終於找到了劉志婉，一位早期革命者的遺孀，1946年秋季，他經王季恩先生介紹，在溫州甌海中學執教，與他在一處的還有洪秀榮、黃禹石、趙養性等，他們成了甌海中學的左派教師。

1946年，是溫州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再度掀起的一年。在王國龍領導下，恢復了組織；安明波、章宏業和我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挺進隊也併進來了，一時山花爛漫。各中學都有我們的支部。我們的人幾乎都是各校各班裏的高材生。在反蔣、反獨裁、反饑餓的學生運動中，我們的人是與中共領導的學生共同進軍，兩路分兵。無疑地，松祺在運動中又發揮了他獨有的創造力。溫州被人視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四大基地之一。這份殊榮，也有我的帶路人——林松祺流的汗和血。

1947年，正是經劉志婉的介紹，林松祺來到上海，先是在肇和小學教書，後來經錢天起先生的介紹，先後執教於國強小學、建承中學和正始中學。教書只不過是我們的職業，無非混口飯吃，好在上海立定腳跟。從1947年起，直到我們離開時止，我們一心撲在事業上——想望著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會在神州大地，星火燎原，風捲巨瀾。松祺、宏業和我三人簡直形影不離。我們分頭參加學運工作，工運工作，婦運工作。上海是個各種政治勢力的大熔爐，鬥爭非常激烈。國民黨視我們為死敵，要抓、要關、要殺。自從出現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以來，我們的人被抓、被關、被殺的難道還少嗎？但是在我們的前頭、旁邊，還有中國共產黨員，他們接受了第三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視我們為“反革命”、“托匪”、“漢奸”、“特務”。我們的運動之所以規模如此之小，力量如此之弱，同時我們的步履維艱，前進一步就必須後退兩步不無關係。松祺是處在這種嚴酷環境中進行鬥爭的能手。他態度沉著，目光銳利；在宣傳中有驚人的耐性。我們的領袖彭述之異常器重他。在建黨大會召開之前，親自帶領松祺前往南京看望我們的人。1947年底，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S.Y.）市委籌委會，松祺被指派為籌委之一。他與宏業一道領導交通大學、上海師專、同濟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還有幾所有關中學的學生支部。上海S.Y.正式成立時，宏業被選為市委書記，松祺被選為市委宣傳部長。我們還共同參加《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編輯部，共同主持香港、台灣、南京、杭州等地的通訊聯系工作。1947年底，1948年初，活動

開展起來，工作也相當順利，彷彿已是“滿眼生機”。加上1948年8月，我們的建黨大會召開，建成了中國革命共產黨。彭述之、劉家良、尹寬、喻守一、陳碧蘭等領導人，對我們的事業前途，滿懷信心。我從建黨大會開會歸來之後，把信息帶給了松祺、宏業。那時，我們三人何等高興：“已見好花在，更期明月圓。”這是理想嗎？抑或是“遙遠的夢”？大概萬里長江，也要繞過千灘萬壑。1948年底，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共產黨就要兵臨上海了。我們的中央，作出了“應變決定”。我和松祺、宏業奉命撤離上海。我、松祺、我妻先走，到廈門投奔安明波先生，而宏業帶著未婚妻出走台灣轉香港。松祺與唐玉蓮從此分手，人間無處再相見。宏業帶著未婚妻，按理應該是有情人可成眷屬，卻不料他的未婚妻於1950年回大陸探親，從此永遠成了未婚妻。

1949年2月底，松祺、我、我妻三人，靠我妻變賣了一點可憐的黃金首飾，湊足盤纏，買了“元培輪”五等艙票，離開了上海。記得托洛茨基最後一次離開莫斯科時，他向第一次到達莫斯科時所看到的“塔樓”和“城牆”投去最後一瞥。而我們這次離開上海時，也向第一次到上海時所看到的黃埔江水投去一瞥，而我的好友松祺，正好是投去了他那最後“一瞥”。

我們到了廈門，就去找安明波先生。安先生把我們安置到漳州專區的海澄中學當教師。我們又與安先生的命運相逢了。

在海澄中學，松祺只生活了半年。那時，國民黨的特勤學校退居海澄。名為特勤學校，實際上這裏面的編制，多數是國民黨的軍長、師長，正集中起來要向金門、台灣撤退。他們閑著無事，偏要海澄中學校長林汝昌派個教師去作報告。校長就派松祺去。這是個難題。講甚麼？智者不惑，他就以“美國的門羅主義”為題，作學術報告。借門羅主義大罵一通美國佬。這些軍長、師長們心中有數，罵美國就是罵蔣介石的主子，只差一點未點蔣介石的名罷了。因此特勤學校的教務長（姓張的）私下通知海澄中學，要注意我們從上海去的人。幸得松祺不久離開海澄到香港去了。我和我妻留了下來。但是，一因他的那次學術報告，二因安先生在廈門大學被警備司令部特務頭子毛森抓去。海澄人便懷疑我們夫妻是共產黨。接著海澄解放，又接著到了1952年冬至節，這是全國一網打盡“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冬至節。當我們夫妻二人以及在海澄的其他托洛茨基主義者周履鏘等被押上囚車之後，從此“紅皮白心”的交響樂，大概在海澄縣（即今龍海縣）上空至少回蕩了四十年。

1949年7月間，松祺搭乘最後一班荷蘭郵輪離開

廈門前往香港。到港之後，他見到了宏業、錢川、康溪、丁毅，還見到了彭述之、陳碧蘭。他在第一封信中，心情極端興奮，詳細地描述了香港風光，我們的組織活動，自己人的生活情況，他還忘不了給我妻道歉：“真想不到她在懷孕六七個月的關鍵時刻，竟把他積蓄起來幾乎所有的錢都贈送給我了。這種深情厚誼，對照我平時對她的想像，實在於心有愧。”

那時，中共大軍已經南下，漳州、海澄一帶不戰而克。廈門的解放，則拖延了兩個月左右。我與松祺通訊因此中斷。待到廈門解放，郵路恢復時，他的信已是從廣州發來了。

如果記憶沒錯，松祺該是 1949 年下半年返回廣州的。承王季思教授的作保並推薦，考取了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1952 年畢業，留校任助教，並兼講師職，可以開課。一個從鄉村貧苦家庭出身，如今有了這樣學術地位，松祺已感到心滿意足了。在來信中時常有這種情緒的流露，但是，個人命運，不能不與歷史命運緊密相連。禍兮、福兮，並不單純掌握在自己手裏。在中大歷史系，恰好碰到了一個從溫州樂清的一位姓連的（連東京？），政治蓋子揭開了。一場“斯——托”論戰被迫在中山大學的小範圍內重演。顯然，松祺處於極端劣勢，壓力很大。真是天旋地轉，局面早已不同了。王季思教授，迫於自身的利害權衡，一再勸說松祺向當權者自首，許多因素的結合，也爲了考慮王季思教授的特殊地位，松祺屈服了，向當權者寫了自白書。他在自首之後，給我寄來一封信，大約是在 1952 年 10 月寫的，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他們都已知道我的情況，季思先生也要我交待自己問題和你的問題。我向季思先生說明在不談你的問題作爲條件，我可以自首。無論如何，你必須小心謹慎，最好是轉移陣地。”（大意如此）

1952 年 12 月 22 日——冬至節，一份獻給斯大林的壽禮——中國大陸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全體被捕。

我們失去了一切聯繫，身陷囹圄，靠幻想度日了。1957 年 8 月，當權者集中部份被捕的托派分子進行六大城市參觀學習。從武漢監獄來的陸續告訴我，松祺已經身亡。他臨終前碰到熟透者，總是重複三句話：（1）我要回到中山大學；（2）這是個誤會；（3）我對不起自己的朋友。他於 1955 年左右死於武漢獄中。

* * *

* * *

時間車輪飛轉，松祺離開我們將近四十年。我常對妻子說：松祺早去了，我們能活到今天，都是撿來的。晚風吹來，不能不回首當年，松祺是我的好友，我的帶路人。當年相處的音容笑貌，彷彿就在眼前閃現。但每想到他臨終前的三句話：就滿腹狐疑，到底是甚麼意思？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

1993 年春節，松祺的阿弟夫婦，出人意料之外地到我家拜年。他們對哥哥一片深情，無限懷念。他們要我做兩件事。第一弄清哥哥死亡的確切日期，骨灰的安放地；第二要給他哥哥寫點東西。這兩件事都是義不容辭的。

四月間，我向上海朋友，並通過他向廣州、廣西、湖北等地曾與松祺一起關押過的，共同勞改過的老朋友打聽真實情況。上海的李培轉來廣東謝山、廣西姜君羊的信，湖北徐燕蓀直接寄信給我。他們異口同聲，說他被捕以來，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從廣州押解到武漢的途中，向押送人員宣講：“我們不是反革命。”小組學習開會，他始終表示：“我們與中共只是有不同的政見”。因此被扣上了“頑固分子”，小組批鬥他，捆綁他，肉體受到摧殘，刑期也由原判七年加刑到十五年。對待所有這一切，他寧可玉碎，而不願瓦全。三句話的真實含義，全都弄明白了。也許當年傳話的人，迫於環境特殊，故意把話淡化了。然而，譬如一江春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在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下，我的好友松祺，最終不愧爲一位英雄。

（松祺的弟弟，後來親自到湖北尋找他的哥哥的骨灰，結果只取回一包黃土。）

[未標明寫作日期]

周履鏘注：

2006 年 4 月，我到溫州尋找周仁生翻譯的《托洛茨基文集》補編的譯稿，在仁生家裏，和趙青音共同整理，除了基本上找到了上下兩卷的譯稿的底稿之外，還企圖尋找周仁生其他的遺稿。仁生原沒有打算寫回憶錄，在朋友的一再督促下，也有了寫回憶的想法了，曾在給我的信中談及寫作的大綱。仁生去世後，我曾問趙青音，仁生寫的回憶錄完成了多少。青音說，他還沒有寫。這次我在仁生的遺稿中，全部找了一次，結果僅發現這篇遺稿。未標日期，我估計是應松祺弟弟之請而寫的，大約寫於 1993-94 年。

2006 年 12 月

《懷念集》

懷念謝山

李平

我認識謝山已有半個多世紀了。抗戰勝利後，上海育才中學有個「哲學班」，中國托派領袖彭述之講唯物辯證法，聽課的有四、五十人，有位個子修長，眉清目秀，文質彬彬，一派書生風采的同學，人家介紹說：“他叫嵇山”，這個名字很優雅而響亮，給我深刻的印象。那時候環境複雜，大家都不用真姓名，有的人起的名字很古怪，如“無住”等。我們稱彭述之為“陳教授”，如果外頭有人來時，就由彭述之的女兒站起來念英文。我與嵇山只見過幾面，談過什麼都忘記了，不久，聽說他在滬江大學畢業後去香港工作了。在《青年與婦女》雜誌中看到他寫的幾篇書評和劇評，邏輯性強，文筆流暢，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評中，激情洋溢，令人鼓舞。

有一年，我回廣東老家去，在香港陸續家裏又遇到嵇山，他住在陸續前房，已經結婚，我們好比老朋友，一見如故，他十分客氣，情深誼重，才知道他的真名叫謝越秀。我悄悄地問陸續：“他是同志嗎？”回答說：“同情者”。當時托派中央已遷至香港，彭述之也在香港，陸續又是香港的負責人之一，他們對越秀的思想影響一定很大。

1948年底我被國民黨逮捕，半年後交保釋放，當時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為恐再次被捕，我回到了廣州。得知越秀因信箱接收第四國際刊物，被港英當局逮捕後驅逐出境。聽說謝在審訊時，用英語憤怒地質問洋幫辦：“接收外國郵件犯什麼法？你們這叫什麼民主？”竟然遭到一拳一腳，把他打倒在地，連眼鏡也打掉。其後越秀毅然在獄中加入了「中國革命共產黨」（托派）。

香港當年還有陸續、王凡西等人也由於幾個信箱接收國際郵件被捕，驅逐出境。陸續到農村參加土改，越秀則到廣州，考入糖業公司當會計。我曾去公司找過他，知道他工作很好，我希望他注意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因為史達林反托中共也反托，他表現得很堅強。不久廣州劉潮被捕，我就沒有再與越秀聯繫了。

幾年後我再次見到越秀時，是1954年在湖北勞改隊裡。1952年12月22日全國肅托，一晝夜間“一網打盡”，越秀也被捕了。關禁了一年多後，才被莫須有地宣判為“反革命”，他被判五年刑，我15年刑，勞動改造。

中南區的部分同案，從廣東、廣西和江西，集中到武漢，共二十餘人，幾個女的在監獄被服廠勞改，

男的除陸續一人留在監獄修理汽車外，其餘被送到漢陽一磚瓦廠勞改。我們大都是知識份子，八成是大學生，有的是中學校長或日報主編，大家都坐了一年多牢獄，不見天日，沒有走動，個個面黃肌瘦，步履維艱，如今要在磚瓦廠勞改，都得去挑土，與泥巴打交道，經受這苦役的磨練！越秀本是個弱質，瘦骨嶙峋，從未搞過體力勞動的人，要他挑土，那怕每只竹筐只裝一拳頭的泥土，也是難以承受的。但越秀從不畏難叫苦，寧死不屈，硬是拼出全身力氣，用雙手墊住肩膀，把擔子挑起來，七顛八倒地往前走。難怪廠裏的老犯人看了喊“作孽”！但也有譏笑我們這些人是在扭秧歌哩！

勞改生活：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所謂學習，就是“認罪服法，改造思想”，天天批判托派的“罪行”，誰不喊“托匪”，就得挨批受鬥。中國有句老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大都消極學習，不得不說幾句假話，“難得糊塗”。學習時越秀總是坐在後頭，從不發言，非輪到他發言不可時，才人云亦云，胡亂說幾句。他性格內向，本來不大愛說話，其實他想得很多，思想清晰，理念堅強，就是含而不露，裝得落後的樣子，不為人注意。有個小江，是個胖子，他大學畢業，能說會道，原是托派的活動分子，如今在勞改隊裡，只見他拼命勞動，卻啞口不言，或則語無倫次，使人莫明其妙，他得了一個綽號：“糊塗”，連勞改幹部也喊他“江糊塗”。

隊裡後來調來一個林松棋，他是中大歷史系助教，為人剛直，認為歷史是不可歪曲竄改的，他堅決不承認托派是反革命，不肯說什麼“托匪”，結果慘遭殘酷批鬥！一些相信“立功贖罪，提前釋放”的，積極參加了批鬥，按他的頭，抓他的發，踢他的腰，慘不忍睹！由於他“不認罪服法”，後來被單獨關押禁閉，不久便慘死獄中，中托史上又添了一起冤案！這樣的批鬥會，越秀往往看下去，就裝作小便離開了會場，在廁所裡遇到同樣心情的李唐，相對苦笑一下，憤慨之情盡在不言中。我與越秀在一個小組裡，同吃同睡同勞動，真是形影不離，親如兄弟。他喜歡背誦詩詞，古文底子極好，我也口頭跟他學了李煜的幾首詞，有時候他在自吟自唱，但從不告訴別人創作了什麼詩詞。越秀體弱多病，大家都很關心他，可他從不要別人照顧，反而盡力去幫助別人，例如，他看到有的“內務”不整齊，便去替他將被物折疊好；看

到那裡髒了，就去打掃乾淨。後來越秀也得了一個有趣的雅號：“林妹妹”，一來形容他弱不禁風，二來爲人可愛的意思吧。

一年之後，原來我們與其他犯人隔離勞動，生怕這些人煽動鬧事的，後來，大概上頭看到這些人積極勞動，又有文化，便把這個小分隊全部調到鐵工廠去勞改，搞技術工作。鐵工廠擔負全廠機器的維修，這些人調來後，有的打鐵，有的翻砂，有的做鉗工，有的學車工，唯獨越秀以其名牌大學會計本科畢業的資歷，被分配在辦公室當勞改記工員。原來他身體瘦弱，搞體力勞動無力可使，全無工效；如今當了記工員之後，如魚得水，所學的會計本領，用在這小小鐵工廠裡，大材小用。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會計制度，從而改進了鐵工廠的管理，有條不紊，增產節約，一清二楚。幹部做總結，對犯人講生產，資料都是越秀提供的，照講無誤。鐵工廠因而成了先進單位，後來迅速發展成爲機修車間，越秀是功不可沒的。

1957年3月，越秀五年刑期提前釋放，所有五年刑期的也都一起釋放，女的超過五年的也一律假釋，我和“江湖塗”也減了刑，勞改幹部反覆講：“你們的案件，今冬明春就會解決的。”後來，開展了反右運動，政策越來越左，“今冬明春”就無聲無息了。

聽說越秀回到廣州，原單位已把他開除了，他沒有工作，只好去挑泥，每天一元錢。那時候他已有一男一女，妻子含辛茹苦，等了他五年，如今他回來後又沒有工作，一家四口怎樣生活？妻與兒女便先後去香港定居，文革前他們就離了婚！萬萬沒有想到服刑五年後，又遭到妻離子散的慘劇！而後來在那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他又作爲“牛鬼蛇神”，在自行車廠原來搞統計的，卻要他下車間搞重體力勞動，遭受到時間更長、更加悲慘的迫害！

我愛人也勞改五年，與越秀先後釋放，起初大家常通通信，互相勉勵，到“文革”時就音信斷絕了。直到我1983年回家後第二年，才試著跟越秀通信，不久就接到他給我一首熱情洋溢的詩篇《寄故交》（後來收入他的《苦口詩詞草》內）。詩中“生來風骨尚錚錚”，正是他的爲人之道，光明磊落，風骨傲然，雖然一生坎坷，但終身無悔！

越秀的晚年，卻有一段感人的羅曼司，我曾讚譽之爲“刑場婚禮真摯愛”：小胡與他先後釋放，之後互通音信，互相勉勵與關懷，逐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悲慘的歲月，各自都遭受不幸，越秀被折磨得病魔纏身，幾乎奪去他的生命；而小胡在艱苦勞動中又發生工傷，被貨架上倒下來的重物壓傷，生活不能自理！而他們卻一個在廣州，一個在武漢，千里迢迢，不能互相幫助和照顧，多麼的焦急，多麼的難受！

於是小胡果斷地提出結婚，卻遭到單位領導的阻撓，一拖三年！他們的相愛，是革命同志真摯的愛，不爲金錢，甘心情願犧牲自己爲了對方健好，全心全意爲挽救對方垂危的生命，這樣的結合，就好比刑場上槍斃前的婚禮，是在死亡線上的掙扎，這是世間最純潔、最真摯、最偉大的愛！

若干年後，我與越秀久別重逢時，中國已改革開放，他被借用到廣州會計師事務所，成爲註冊會計師，以他的高等學歷，精通英語和豐富經驗，經常到外資企業檢查賬目，作出了顯著的成績，成爲經濟建設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與小胡一起互相體貼，互相照顧，過著晚年幸福的生活。家裡有個很大的書櫥，藏書豐富，分門別類，連報紙、書信都保存得有條不紊。可見他工作之餘，還努力學習，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90年後，我在上海鄭超麟老人處，看到越秀給老人的好些書信和論文，字跡清秀恭整，洋洋數千言，內容有談論時政的，有研討詩詞的，可見他那幾年思想十分清清晰，精力依然充沛，他是多麼希望“留將老眼看滄桑”啊，卻不幸於96年過早與世長辭了！

他臨終前，付出極大的努力，把所寫的詩詞整理成冊，這本《苦口詩詞草》與鄭老的《玉尹殘集》可說是獄裏外吟詠的姊妹篇，絕非世間風花雪月之作。越秀的無畏精神和跌宕有致的詩詞、剴切中理的政論，將永留人間！



感懷試吟

李平

三生有幸遇老鄒

卅載牢獄階下囚 半生坎坷一身留
苦盡甘來豈可信 三生有幸遇老鄒

劫後倖存已白首 天堂地獄曾翱游
平生不作虧心事 昂首闊步往前走

人間恩情重千斤 欣慰但願人長久
餘生猶冀昭雪日 留將老眼看新舟

手拉手 防跌倒

老太和老頭 互相照顧好
出門手拉手 小心防跌倒

上下樓要慢 扶手要拉好
獨自出門去 路滑易摔跤

摔跤會骨折 手傷裹石膏
腳傷躺床上 數月不能走

人老先老腳 腳好人不老
時刻要當心 千萬防跌跤

詩贈越秀、洛卿

漢陽一別幾十年 忽接來書五千言
斑斑血淚訴不盡 歷歷傷痕志更堅

刑場婚禮真摯愛 劫後餘生苦亦甜
健身有術能增壽 一片丹心照萬千

1984年3月

上西樓

兩老攜手漫步 日已出
綠葉叢中有氧空氣足
身未殘 開懷唱 夜鶯曲
半生坎坷晚來應享福

一枝花

謝山詩詞人人誇 良藥苦口傳千家
追求真理遭迫害 留給人間一枝花

無限好

清晨空氣好 公園鍛煉早
打打羽毛球 健康人不老

無憂又無慮 事事不煩惱
快樂賽神仙 晚年無限好



病中情結

兩老同心相作伴 朝夕攜手去散步
人生旅途末班車 歡樂與共無煩惱

老漢因事回廣州 勞碌奔波人難受
十二指腸大出血 急忙住院來治療

老太聞知心焦急 一心前去伴老頭
人地生疏路遙遠 耄耋之年怎能走

女兒最懂母親心 恰逢休假有空閒
木蘭代父從軍去 我替母親侍親人

立時飛往廣州去 殷勤照料暖老心
逢凶化吉病轉好 電話天天報佳音

病癒出院需療養 老太前來伴老漢
同把身體頤養好 幸福花開萬年紅

賀新居

覺真新居在赤峰 環境優美綠蔥蔥
兩室一廳空氣好 三樓上下正適中

裝璜華麗氣象新 酸枝古椅擺客廳
灶間浴室巧安排 黃皮沙發最稱心

南窗寄傲小剛樂 身體健好去工作
電腦操作我內行 換了人間真快樂

覺真老來應享福 女兒就住附近屋
媽媽李伯住得遠 天天來煲電話粥

相見歡

林蔭道上清風 迎朝暉
三五老叟健身花叢中
左開弓 右騰空 意正濃
耄耋之年不倒翁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曼德爾等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4卷第1期（總第222期）

2007年6月28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3494 1762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 (852) 9846 3428 Fax: (852) 3494 1762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Resistances of villagers of Shantou City in China

Zhang Kai

Whil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tressing the need to build a society of harmony, many incidents indicate serious disharmony. One manifestation is the clashes in interest between local cadres and the masses. The land issue stands out as a major issue. The homes of local residents are demolished, or the farmland is appropriated, and then the land is sold at a high price to developers, with little compensation for the residents or peasants. Grievances lead to protests and resistances.

In Shantou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unrest again broke out during the week of May 1, 2007. Villagers of Guyao Township, Chaoyang District suspected the rural cadres of corruption in the land deals, and organized squads to assault the homes of cadres, rob their household items, and destroy police cars. (Hong Kong Ming Pao, May 8) The unrest continued for a week, and spread to Tongyu Township in the vicinity. Several hundred villagers besieged the villag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a factory, and demanded the removal of the factory. Illegal land deals in the village are rampant; 60-70% of the farmland has been sold to factory owners to build factories, and some

peasants have not got any compensation. Villagers claimed that it was general knowledge that every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had amassed tens of millions of fortune.

The authorities have adopted a restrained attitude in order to calm things down. Two village cadres were on the wanted list, but they had both disappeared.

The incident shows that firstly, even if the party central authorities issue many resolutions and orders to discipline corrupt cadres, corruption is still rampant in the local. This is induced by the bureaucracy. Anti-corruption resolutions are mere empty words on paper. Secondly, the administration's work report also stresses the need to defe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event illegal occupation of land, and yet the illegalities are happening everywhere. Thirdly, the Right to Property Bill was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March 2007, yet the right to property of villagers and urban ordinary folk is not protected from the violations of bi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This is probab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apitalism.

May 14, 2007

Riots against birth control in Bobai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Zhang Kai

Upsurges in Shantou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occurred in the first week of May 2007. Within ten days, riots erupted in 8 villages in Bobai County in the neighbouring province of Guangxi, where villagers broke into the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burnt things down, and even beat to death some officials in charge of birth control.

The incident originated with a birth control conference in Guangxi Province early this year. Bobai County was named as seriously problematic in excessive births, and the authorities were ordered to redress the problem. Hence, the Bobai authorities issued 28 birth control policies this year, stressing that "iron-like resolution, means and discipline" will be imposed against birth control violators.

Some measures included: out of quota births after 1980 have to pay a fine of 10,000 to 70,000 yuan (USD1=7.5 yua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have previously paid any fines. Those who cannot pay will have their household items removed and pigs and poultry seized; household items not worth anything would be smashed.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given a quota of completing one case of contraception operation on a woman and collection of a fine of 500

yuan before the end of August. (Wen Hui Pao May 22, 23) When the local cadres implement the policies with force, it induced serious resentment and rage of the villagers. It is reported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rioted.

When social disparities are serious, and peasants are already leading a difficult life, the further extortion of money from the peasants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drives peasants to rioting. In Bobai, faced with the riots, the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dispatched the military troops, and on the other hand suspended the fines.

Such measures of greed and indiffere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have intensified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The Bobai riot is only one among many, and made visible because of media reports.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statistics, from 1994 to 2004, within a decade, mass unrest incidents have risen from 10,000 cases to 74,000 cases, which is an annual increase of 22.2%. The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has risen from 730,000 man-times to 3.76 million man-times, which is an annual increase of 17.8%. This is the state of "harmony" in today's China.

May 28, 2007

香港	2	保衛香港的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此同時.....	振言
中國	3	汕頭村民抗爭的啓示	張開
	4	博白縣大騷亂的前因後果	張開
國際	6	日本政府推動在靖國神社“合祭”戰犯	趙京譯
	6	要求立即解散自衛隊的“情報保全隊”	趙京譯
	7	靜岡縣民抗議開發機場自焚身亡	趙京譯
	8	爲委內瑞拉新聯合社會主義黨的演講	雨果·查韋斯
	9	大選之後：一個委內瑞拉革命的新黨派	斯圖爾特·派普爾
	11	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來自委內瑞拉的最初的教訓	斯圖爾特·派普爾
	14	世界社會論壇：權力屬於人民	丹尼艾爾·方特因
	14	處在爭論焦點的非洲	讓·南加
資本主義	15	官方報告：資本主義正在毀壞我們的地球!	衛眾譯
弊病專頁	16	大壩工程與人類命運	周仁生譯
	16	美國媒體與流行文化助長兒童暴力行爲	湯姆·桑得斯
	19	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納特·溫斯坦
通訊	21	美共和中共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困誤	趙京
理論	22	超達爾文主義者，你們走得太遠了！	克利夫·科納
回憶	27	晚風吹來憶往昔：林松祺——我的帶路人	周仁生
	31	懷念謝山	李平
詩詞	33	感懷試吟	李平
英譯	35	Resistances of villagers of Shantou City in China	Zhang Kai
	35	Riots against birth control in Bobai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4 ISSUE 1 2007.6.28

Hong Kong	2	Defend freedoms of speech, publication, and media in Hong Kong.....	Zhen Yan
China	3	Resistances of villagers of Shantou City in China.....	Zhang Kai
	4	Riots against birth control in Bobai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Zhang Kai
International	6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goes for public tribute to Yasukuni Shrine	(tr.) Zhao Jing
	6	Immediately dissolve the Japanese SD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gency!	(tr.) Zhao Jing
	7	Suicide of Shizuoka prefecture residents against building of airport	(tr.) Zhao Jing
	8	“For a new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	Hugo Chavez
	9	After the elections: a new party for the Venezuela revolution.....	Stuart Piper
	11	The challenge of socialism in the 21 st century	Stuart Piper
	14	World Social Forum: Power to the people!.....	Danielle Fonteyn
	14	Africa at the heart of debates	Jean Nanga
Special page on	15	The official report: Capitalism is destroying our planet.....	(tr.) Wei Zhong
Ills of Capitalism	16	The dam project and the destiny of humanity.....	(tr.) Zhou Rensheng
	16	USA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foster violence in children.....	(tr.) Zhou Rensheng
	19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what is going on?.....	(tr.) Zhou Rensheng
News	21	Theoretical errors of CPs of USA and China o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Zhao Jing
Theory	22	Super Darwinists, you have gone too far!	(tr.) Zhou Rensheng
Memoirs	27	Commemorating my mentor Lin Songqi	Zhou Rensheng
	31	Remembering Xie Shan	Li Ping
Poems	33	Feelings and thoughts.....	Li Ping
Articles in English	35	Resistances of villagers of Shantou City in Chia.....	Zhang Kai
	35	Riots against birth control in Bobai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Zhang Kai